



这是2013年4月我从天津路方向拍摄的英商平和打包厂厂房东南侧。英商平和打包厂旧址位于青岛路10号，这一工业遗产是老汉口城市肌理的重要组成部分。青岛路地处老汉口英租界，街道两侧矗立的汇丰银行、花旗银行、麦加利银行、保安洋行等建筑旧址，不仅展现了古典建筑之美，更是老汉口百年历史记忆的留存。10多年前这里寸土寸金，能否保护这块土地上的优秀历史建筑，引来众多市民的关注。包括我在内的许多摄影师，都怀着复杂的心情在此抢拍。得益于政府的政策，青岛路的建筑得到了保护性修缮，焕发了新的光彩。仰俯之间，荣枯往还。十几年前的一“咔嚓”，蝶变成当今无数人争相打卡的网红地。

（摄影 / 撰文 胡晋鄂）

编委会名誉主任：彭富春 罗联峰

顾问：（以姓氏笔画为序）

田子渝 刘玉堂 刘庆平 刘富道
严昌洪 何祚欢 张笃勤 陆永初
陈芳国 姚伟钧 涂文学 彭小华

编委会主任：张明权

副主任：朱向梅 董菲 杨华
刘洪波 熊少明 阮祥红

编委会成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万焕桥 王四清 朱永利 任丽英
刘海燕 李文洲 张智勇 陈胜利
陈红英 林伟 徐莉 潘红莲
燕来宾

主编：阮祥红

副主编：朱伟峰 丁星火

执行主编：丁星火

特约编审：简桦

本期责任编辑：章旷怡

编辑：许濛 刘玮

封面设计：王鹏

时代年轮

<<< <

4 苏联空军志愿队烈士墓追踪 / 谌达军

风雨同舟

<<< <

14 梦想重回“大武汉” / 叶青

九城同心

<<< <

19 “江湖水生鸿雁来”
——诗文中的苏东坡与鄂州（下）/ 夏建国

委员天地

<<< <

23 爱满江城，用汉绣传递美好
/ 黄春萍（口述） 章旷怡（整理）

商聚汉皋

<<< <

28 坚守“膳”心 不负“食”光 / 邢云（口述） 闻夕（整理）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人物春秋

<<< <

- 33 从《姚锡光江鄂日记》看刘鹗争办卢汉铁路 / 刘 飞

都市史话

<<< <

- 39 江汉关究竟何时“开”关 / 张胜林 范 榕
45 武汉系列童谣“三岁的伢” / 彭翔华

扫街探疑

<<< <

- 49 “巴公房子”百年石刻及“巴公”探秘 / 胡全志

史海钩沉

<<< <

- 54 武汉蔡甸王公合葬墓志铭研究
/ 宋 贝 张 剑 朱励博 陈守宇

高校访馆

<<< <

- 61 大自然馈赠的珍宝——华中农业大学博物馆 / 王若颖

主 管：政协武汉市委员会

主 办：武汉市政协文化文史和
学习委员会

编辑出版：《武汉文史资料》编辑部

发行范围：国内外公开发行

发行单位：《武汉文史资料》发行部

国际标准刊号：ISSN1004-1737

国内统一刊号：CN42-1056/K

印 刷：武汉市仁大印务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每月 28 日

定 价：8 元

地 址：武汉市汉口沿江大道 246 号

邮 编：430010

电 话：（027）82220669（传真）

E-mail：whzxwszl@163.com

苏联空军志愿队烈士墓追踪

◇ 谌达军

轮印：1954年，在苏联留学的朱育理（后任中国航空工业公司总经理）注意到班长的姓名——依娜·库里申科，与之谈起援华抗战的苏联英雄库里申科，不意开启了一段尘封历史。1937—1941年，苏联空军志愿队援华抗战，214位战士牺牲，依娜成为中国找到的首位英烈亲属。1954年下半年，湖北省和武汉市动议在解放公园修建苏联空军志愿队烈士墓和纪念碑。

库里申科赫赫有名，曾任援华抗战的远程轰炸机大队长，是中国人民纪念苏联空军志愿队英烈群像的标志性人物，因而他的名字刻入了解放公园苏联空军志愿队烈士墓的墓志铭中，尽管他与烈士墓中安息的15位烈士并没有直接的战斗交集。

2013年3月，库里申科的英雄故事再



解放公园苏联空军志愿队烈士墓和纪念碑

次被时代之音激活，我和团队却发现，无法说清苏联空军志愿队烈士墓中的15位烈士到底是谁，如何来华，参加了哪些战斗，怎么牺牲，他们的家人如今何在？他们与库里申科有何关系？进而开启了《武汉上空的鹰》寻访报道和近十年的寻访研究，直到2023



《为了和平——苏联空军志愿队援华抗战记略》

年12月出版《为了和平——苏联空军志愿队援华抗战记略》一书，才使这些疑问都得到了充分回答。而所有寻访和研究的起点，都来自解放公园苏联空军志愿队烈士墓。

烈士纪念：从万国公墓到解放公园

从1938年埋葬第一位苏联空军志愿队烈士，到1951年万国公墓烈士墓，再到1956年解放公园烈士墓，重修、迁建、修



2013年8月，俄罗斯中俄友谊协会副主席伊万诺夫提供1951年万国公墓纪念活动老照片

葺、增刻英名，可以让武汉人走进那段历史硝烟。

武汉解放后，市政府在汉口万国公墓原址重修苏联空军志愿队烈士墓，1951年10月竣工，称作“苏联飞行员烈士墓”。

2013年3月寻访开始，我们找到《长江日报》1951年11月28日头版的一篇消息《武汉市苏联飞行员烈士墓昨隆重举行奠基典礼》，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张难先，秘书长张执一，武汉市市长吴德峰，第四野战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梁必业，苏联友人代表布里杜里斯基，及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等代表一百余人参加。典礼在哀乐和中苏两国国歌中开始，并由张难先、吴德峰、梁必业等向烈士墓献花。



1951年11月27日，武汉市市长吴德峰在苏联飞行员烈士墓落成典礼上致辞

报道仅有580字的消息，没有新闻照片，墓碑样式和典礼场面只能靠想象。2013年6月，我们在俄罗斯采访到92岁的俄中友好协会副主席、全俄老战士委员会中国分委会主席瓦西里·伊万诺维奇·伊万诺夫。他为

我们提供了14张老照片，其中一张上写着“给伊万诺夫，这是武汉为苏联飞行员修建墓碑的照片”，落款人是“洛和林”，时在20世纪50年代，他也记不起这位朋友是谁了。

这14张照片，让我们第一次见到1951年典礼的场面，有张难先、张执一、吴德峰、梁必业和苏联友人代表分别致辞，也有烈士墓入口和纪念碑的影像。烈士墓前树立了石碑，石碑上镌刻着“永垂不朽”，而墓顶安上了象征光明和胜利的镰刀、铁锤和五角巨星。

1951年在万国公墓新修烈士墓时，武汉市政府就提出“另择地点筹建纪念碑”，从筹建到建成前后5年。根据解放公园建设档案和《长江日报》报道，可以基本勾勒出其脉络：

1952年，武汉市政府决定，在西商跑马场原址辟建“武汉市第一苗圃”。1953年12月，在苗圃基础上开始筹建解放公园。1954年下半年，有关部门动议在解放公园修建苏联空军志愿队烈士墓和纪念碑。

1956年3月29日，苏联空军志愿队烈士墓从万国公墓迁至解放公园。3月31日，《长江日报》头版刊发《苏联空军烈士墓迁建工程结束》消息称：“志愿队烈士墓原在汉口中山大道万国公墓内，因该处地点不当，武汉市人民委员会决定择地迁葬，重建墓碑。迁建工程于元月6日正式开工，至3月29日竣工。”

这篇报道专用一个段落描写了新迁建烈士墓的样子：“新迁建的苏联空军志愿队烈士墓，设解放公园东北角朝梅岭与夕桂岭



1956年3月，刚刚建成的解放公园苏联空军志愿队烈士墓

之间，整个面积占一万多平方。墓宽三十二公尺六寸，高三公尺，为花岗石所砌成，正面中间嵌有烈士姓名碑十五块，两旁各镶有纪事碑一块，均为白矾石，用中俄文镌刻。墓前矗立一高达八点一公尺的纪念碑，纪念碑与墓中间有一宽十五公尺、长三十二公尺三寸的广场。碑前有大花坛，并辟有宽坦的混凝土墓道，墓顶和墓道两旁，均有花圃。”

4月5日清明节，武汉各界群众隆重祭扫苏联空军志愿队烈士墓。据《长江日报》报道，祭扫鸣炮、奏哀乐、默哀，献花圈，武汉市委第一书记、市长宋侃夫，驻武汉空军部队负责人和全市各民主党派、各机关团体代表、少先队员共300余人绕墓致礼一周。之后，苏联友人沃罗涅茨致辞。副市长唐星在墓前讲话说，为了中国人民的独立自由而英勇牺牲的苏联空军志愿队烈士，将永远活在中国人民的心里。

搜索文献发现，苏联空军志愿队烈士墓迁建解放公园以来，武汉市政府和民间的祭扫、拜谒活动从未间断。尽管中苏关系风风雨雨，但烈士墓一直得到了完好守护。

2010年11月15日，前来武汉出席中俄印三国外长会晤的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外交部长杨洁篪的陪同下，来解放公园向烈士墓献花圈。

2013年5月14日，俄罗斯总统全权代表巴比奇访问武汉，出席“长江中上游地区和伏尔加河沿岸联邦区地方领导人座谈会”，下午在国务委员杨洁篪陪同下，来解放公园向烈士墓献花圈。

2015年5月6日下午，俄罗斯联邦驻华大使馆一等秘书

达姆李诺夫一行，代表俄罗斯总统普京、俄罗斯国防部及驻华大使馆，向为苏联卫国战争作出贡献的武汉市民蔡转，颁发“伟大卫国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奖章。上午，他也前往解放公园祭扫烈士墓。

2016年9月8日，在湖北访问的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到解放公园瞻仰了烈士墓。

2019年10月18日，在第七届世界军运会开幕的早上，俄罗斯国防部副部长潘科夫将军和俄罗斯代表团20余名军人运动员，来解放公园烈士墓举行祭奠活动。

烈士英名：从7人、15人到29人

2013年寻访启动时，我们发现解放公园烈士墓碑上的15个斯拉夫名字只是一串纪念符号，除生卒年月外没有任何其他信息。他们的英勇事迹似乎已“冷却”，而要还原历史，还得从最早的墓地开始寻找线索。

解放前，尤其是抗战期间的万国公墓是个什么样子？苏军烈士是如何掩埋的？



1939年5月，日军飞行员在汉口“大花园”

2013年,我和团队常去武汉第八医院老院区附近走访老街坊,有的能描述一些情况,但大多也无法核实确定,一直没有太多史料能解答疑惑。

从来没有想到,我竟然在日方出版的书籍中,找到万国公墓及其苏军墓地的历史照片。2019年,我在撰写《为了和平》期间,在“孔夫子老书网”上淘到一本日文《虎部队战记》,无意中看到一张照片上,一群身着航空服的日军飞行员出现在一个墓地上。书中说,这是驻扎W基地(又有称汉口W机场,是日军攻占武汉后,在原汉口机场,今王家墩一带基础上建立的华中最大空军基地,日本海军航空队和陆军第三飞行团都在此驻扎)独立飞行第十八中队中队长荒蒔大尉及6名队员在汉口“大花园”。原来,这是1939年5月沦陷区中文报纸刊发的一张新闻照片,荒蒔听说苏联飞行员的牺牲者埋葬在“大花园”,特意来到墓前,向与他们作战的“SB的苏联勇士”致意(SB是日军对苏联空军志愿队CB轰炸机的音译。CB轰炸机为当时苏联援华作战的主要机型之一),这也是历史吊诡的一幕。

汉口“大花园”,就是汉口万国公墓,这是现在找到的唯一一张万国公墓苏军烈士墓老照片。从照片上看,墓地围墙外有较为密集的居民房屋,苏军烈士墓有两排,每个墓穴土堆前插有木牌,应为烈士姓名牌。

1944年12月18日上午,美国第十四航空大队84架B-29轰炸机对汉口日军实施空袭,总共200架中美混合战斗机群与日军战斗机群激战,击落日机64架。W基地,储存日军物资的码头,日本租界和日本海军机关等被轮番轰炸,几乎夷为平地,而葬有苏军烈士的“大花园”却幸免被毁。

从伊万诺夫提供的1951年奠基典礼照片看,修建的烈士墓中,有两座墓碑上刻着烈士名单,俄文在上,中文在下,记录着15位烈士的姓名和牺牲日期。根据牺牲日期,烈士名字依次排开。第一块墓碑上的烈士,为1938年上半年的牺牲者,7位中有4位在2月的激战中牺牲。第二块墓碑上的烈士,则在7月和8月牺牲。

不过,这15位烈士的姓名并不精确。俄语姓名应由本名、父称和姓构成。而这两块墓碑上,7位有名字的烈士,只刻上了部



万国公墓苏联飞行员烈士墓



万国公墓苏联飞行员烈士墓墓碑一、二

分姓名：瓦新、卡谢洛夫、吉谢辽夫、巴拉莫诺夫、吉皆洛里登、考兹洛夫、比特斯基；另外8位烈士并未辨认出身份，只是冠以“无名英雄”之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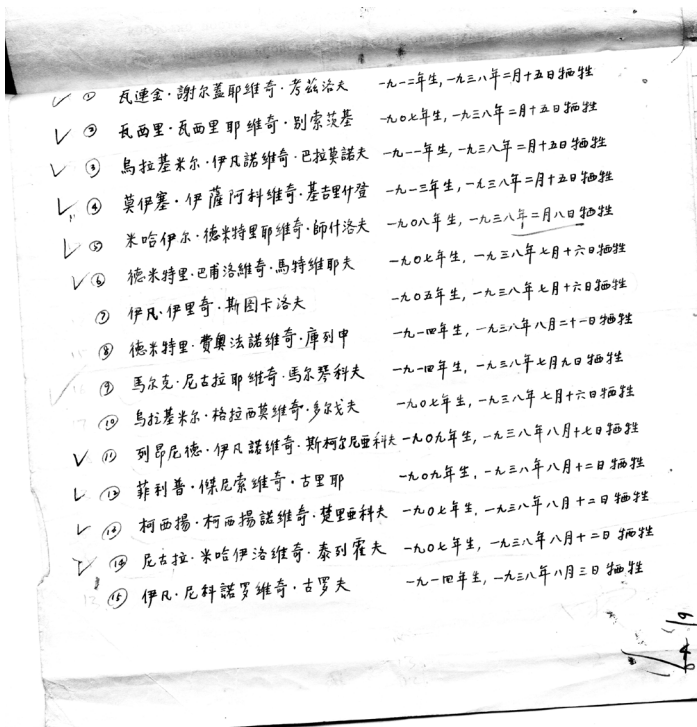
1952年，新华社记者姚昌淦来万国公墓苏军烈士墓采访，他在《永恒的友谊——武汉人民怀念苏联空军志愿队》中写道：“看管烈士墓的是一位年过半百的老人，他一面陪我凭吊，一面告诉我在抗战初期战火纷飞的那些深夜里，他怎样感激和沉痛地亲手埋葬英雄的遗骸，以后每年怎样为这些坟墓加培新土。”

然而，这位亲手埋葬烈士的老人是谁，报道中没有提及姓名，无法进一步追踪。

1956年春，苏联大使馆提供了15位烈士的基本信息，包括姓名（本名、父称和姓）、出生年份、牺牲日期，《长江日报》据此全部刊登。

2013年，我们查阅到解放公园首任主任杨公楫的回忆文章，说到烈士遗骸的迁葬时，发现了很多烈士遗物，如怀表、信件、勋章和纪念品等。这些遗物对还原烈士的人生经历很有价值，我们多方打探寻找，但都不知下落。

2014年，我在比对另外得到的一些苏军烈士名录时，发现他们中间还有多位也是在武汉空战中牺牲的。之后，我将此研究结果向外事部门反映。2015年，经外交部和俄罗斯驻华大使馆共同确认，新发现14位苏联空军志愿队队员在1938年和1939年的武汉空战中牺牲，并埋葬在武汉。中俄两国共同决定，在2015年9月3日抗战胜利纪念日之前，将这14位烈士的名字增刻到解放公园烈士墓碑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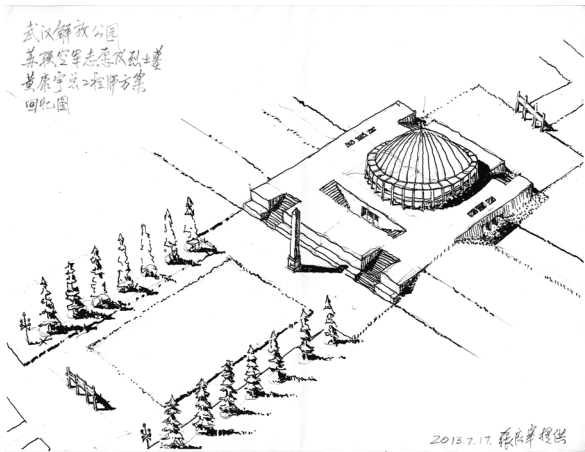
1956年迁墓时，苏联驻华大使馆提供15位烈士的基本信息

亲历空战：从总设计师到工程师

2013年6月，我们寻找解放公园苏联空军志愿队烈士墓的设计者，终于找到了两位耄耋老人：一位是工程师、著名建筑学家、华中科技大学建筑系创始人之一张良皋，一位是总设计师、已故著名建筑学家、武汉建筑设计院总设计师黄康宇的遗孀蔡德庄。

1954年下半年，湖北省和武汉市有关部门动议修建苏联空军志愿队烈士墓。黄康宇负责纪念馆的整体设计。张良皋是黄康宇在重庆中央大学建筑系的系友，负责具体施工设计。

2013年，90岁的张良皋健在，我们去华中科技大学采访几次。谈起烈士墓，老人家说：“那是一项未完工的工程。半个世纪



2013年6月，张良皋绘制的《解放公园苏联空军志愿队烈士墓黄康宇总工程师方案回忆图》

了，一直没有达到设计者的最初设想。”

最初的设计草图迄今未能找到，张良皋只能凭记忆“还原”，绘制了《解放公园苏联空军志愿队烈士墓黄康宇总工程师方案回忆图》。图上，前后设有牌楼，纪念碑、墓台在一条轴线之上，墓台后便是未能完成的穹顶式纪念堂，原本用于展示烈士照片和遗物。他说，当时黄康宇的设计十分宏伟壮丽，纪念堂与墓台连为一体，可沿墓台两侧的阶道拾级而上进入纪念堂。

后来，我们找到了1955年9月15日武汉市民政局给武汉城市建筑设计院的发文档案，这份文件要求设计院即日着手设计苏联空军志愿队烈士墓：苏联空军烈士墓迁移地址和经费问题，经市人民委员会批准，迁移至解放公园内两山之间，经费以五万元为准，除原批示送你院黄光宇（作者注：黄康宇）之任工程师看过，并将该园地形和设计图送交你院外，抄送我局原签报一份。请查收后即着手进行设计，发便报请上级审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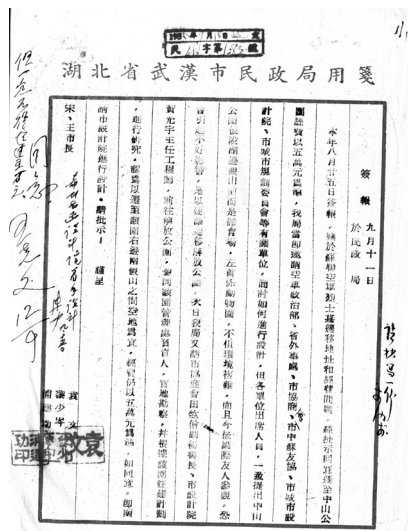
黄康宇是武汉城市建筑设计院的总设计师，也是苏联空军志愿队烈士墓的总设计

师。黄康宇的遗孀、建筑设计师蔡德庄后来说：“我们当年受过他们的恩，后来我和丈夫参与纪念碑建设，就有一种报恩的心态在里面。”

黄康宇、蔡德庄是地道的武汉人，都避难西迁过重庆，经历过汉口大轰炸、重庆大轰炸，也经历过“二一八”“四二九”“五三一”等“空战大捷”。

经历的苦难愈深重，表达的感激愈深沉。在黄康宇的设计方案里，纪念碑是方锥形，墓台是长方形，墓台上镶嵌着烈士石碑，其形制、风格和用材都考虑了苏联习俗。

和黄康宇、蔡德庄一样，张良皋也是“老武汉”，亲历了武汉空战。他2013年回忆说，1938年汉口上空出现的飞机，有了不少单翼机。15岁的他从家中晒台上眺望，一架架飞机从“龟山尾巴”那里飞出来，主机、僚机配合，速度也比过去的飞机快。当时大家都从坊间耳闻，有一批苏联义勇队来帮助我们抗击日寇。1944年，在重庆读建筑系二年级的张良皋投笔从戎，当了盟军的炮兵翻译，奔赴中缅印的抗日战场。



1955年9月15日，武汉市民政局给武汉市城市建筑设计院发文

亲历武汉空战，经历战场厮杀，更深知生命的价值、英烈的崇高。黄康宇、张良皋的设计理念很明确，纪念为保卫武汉英勇战斗流血牺牲的苏联空军勇士们，既要有形式，也要有内容。张良皋担心，烈士陵园若没有纪念堂，烈士的事迹就无法呈现，烈士的音容笑貌就会随风飘逝。设计者的理念，实际上就是设计者的情怀，他们的情怀就是要将对烈士的敬意融入设计之中。

蔡德庄回忆当年参加墓园建设，白天施工，晚上丈夫待在施工现场，她只能一人回家，骑自行车经过一片坟地，心里不免害怕。泥泞的路上不少水凼子，回到家总是一身灰、两脚泥。“干有意义的事，没觉得苦呢！”老人笑着回忆。

工程时间很紧，要求1956年开春基本完工，但紧要关口却没有墓碑所用的麻石和白矾石。天寒地冻，建设、设计单位、政府相关部门不得不在全市四处寻找、协调解决。1956年2月2日，武汉市第四建筑工程公司第一工区给市民政局写的一份请求协助的报告，反映了这项工程建设的紧张情形：

查承建苏联空军志愿队烈士墓工程需用大批麻石及白矾（原文为“凡”，编者注）石料。除一般麻石已送达场并于元月十六日正式开工外，尚有一部分大块麻石尚未觅得。经在市内四处寻觅……市四小学操场地上有210×81×13公分白矾石记事碑一块（较设计图纸标准花饰断面尺量厚度弱十三公分）可作碑座白矾浮雕用，及零星大小块矾石可作姓名石用。私立江苏小学操场内有拆除旧屋之340×35×35公分麻石柱六根，可供碑身大块麻石用。私立济众小学院墙上有115×63×8公分的白矾石记事碑十块，可作墓记事碑及碑座白矾石饰面用……

遗憾的是，这项工程由于工期短，经费又不足，建成墓碑、墓台后就不得不结束了。蔡德庄回忆，黄康宇将纪念坛设计成苏联风格的圆顶式建筑，是想让它成为一座爱国主义、国际主义教育基地。得知纪念坛建设中止，黄康宇好几天不言语。老人2005年去世，享年86岁，生前一直感叹“可惜了”：解放公园风景很好，体量很大，加一个设施不会显得拥挤；没有纪念坛，相关的历史资料、记忆和情感也就随风而逝。

黄康宇去世后，张良皋作《挽黄康宇建筑师老学兄》追思：“巨手启班门，绳尺终能传大匠；灵光存鲁殿，汉皋何可去斯人。”

跨国呼唤：从俄罗斯《等着我》到央视《等着我》

2013年，武汉保卫战75周年，年已90岁的张良皋通过俄罗斯国家电视台《等着我》节目，寻找墓碑上的15位烈士后裔，希望有生之年能见到他们的亲人。《等着我》是俄罗斯国内收视率最高的大型寻亲电视节目，在白俄罗斯、乌克兰等国家也落地播出，影响范围很广。

老人在给节目组的信中写道：1938年我还是一个15岁的懵懂少年。我和很多玩伴一道，空战警报响起时不愿躲进防空洞，反而跑到户外观战。我们看着苏联空军志愿队与中国空军的飞机从汉口王家墩机场一架架起飞。我们看着这些战鹰掠过龟山，掠过长江，向东飞去，迎击来犯的日寇……据后来的报纸报道，共有200多位年轻而勇敢的苏联空军志愿者在中国献出了生命。由于战争的缘故，很多烈士的档案资料残缺不全，很多烈士我们无法核实。

老人呼吁当年志愿队烈士的亲人能与

节目组建立联系，还原英烈生前身后事。“这是我的愿望，我相信，这也是两国人民的一个共同愿望。期盼你们有机会来到武汉，来到解放公园一隅那肃穆的烈士墓前，抚今追昔。如果可能，我很想与你们见见面，或通电话，若能和烈士们的亲人有所联系并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则幸莫大焉！”

女主持人玛利亚·瓦西里耶夫娜·舒克申娜朗读了这封来信，节目录制现场的观众神情凝重，不住地抹去眼角的泪水。

2014年6月19日，“卫国战争的爆发——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9周年”展览，在武汉辛亥革命博物馆揭幕，邀请张良皋出席，与俄罗斯驻华使馆公使衔参赞陶米恒在现场见面。那天天气炎热，91岁的张良皋依旧身着有点厚的抗战老兵夹克，佩戴老兵帽。从下车地点到现场距离很远，但老人谢绝主办方安排的轮椅，坚持步行到达会场。老人说，这是中国人的礼节，也是中国人的气概。

在回行的车上，我问老人，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苏联空军志愿队援华这段历史。老先生顿了一下，眼神直直地望着窗外说：“我泱泱中华，应滴水之恩涌泉相报；我泱泱中华，亦应自立自强。”



黄康宇和蔡德庄夫妇中年时期的合影

2015年，张良皋去世，享年92岁。此时，烈士墓上29位烈士的信息，经我们的寻访已补充完整，老人所祭奠的“恩人”的音容笑貌和英勇事迹并没有“随风逝去”。

2016年，在“九一八”纪念日前夕，黄康宇遗孀蔡德庄以耄耋之年赴京，在央视《等着我》节目连线俄罗斯，继续寻找墓碑上烈士的亲人。临行前，女儿黄宝玲几次做妈妈的工作，希望她以身体为重不要远行，老人却执意前往。老人对节目组工作人员说，她这次来京就是想完成老伴的遗愿，一时老泪纵横。老人回忆了他们在武汉、重庆经历大轰炸的惨烈场景，讲述了黄康宇1938年目击苏联空军志愿队队员跳伞的情形。当讲到黄康宇至死未能看到自己设计的纪念坛完成时，老人数度哽咽，主持人倪萍和几位嘉宾也忍不住落泪。

遗憾的是，当那扇“希望之门”打开时，远在俄罗斯的栏目记者，并没能带来更多的烈士信息，寻找还在继续……

值得一提的是，无论是张良皋走进的俄罗斯第一频道《等着我》节目，还是蔡德庄走进的央视《等着我》节目，都与库里申科相关。2010年5月央视《等着我》首期开播时，请来的嘉宾就是开启这段尘封历史



2013年6月，张良皋在解放公园苏联空军志愿队烈士墓前

的朱育理，他要寻找多年未有联系的班长依娜，而俄罗斯《等着我》的制片人谢尔盖就是依娜的儿子。

2018年，蔡德庄去世。俄罗斯驻华大使馆致慰问函：“今闻蔡德庄女士于2018年2月21日去世，我们感到万分悲痛。蔡德庄女士与黄康宇先生为纪念苏军援华烈士做出了不懈努力，1956年在武汉解放公园建成的苏联空军志愿队烈士墓，是由蔡德庄女士的丈夫黄康宇先生主持设计建造的。此后数十年，他们伉俪二人为了保护苏联空军志愿队烈士墓付出了巨大心血。”

2018年上半年，解放公园管理处启动建设苏联空军志愿队陈列馆工作，以弥补当年因经费而未建纪念坛的缺憾。张良皋1950年代设计的解放公园另一座苏式建筑——老电影院，如今成为“苏联空军志愿队陈列展”所在地，解密的档案，英烈的遗物，展现昔日的烈火丹心。

寻访与研究这段历史多年，我与黄康宇、蔡德庄的女儿黄宝玲女士交往很多。蔡德庄总对我说，当年的迁建工程很急，从启动设计到建成总共8个月时间；黄宝玲女士则老和我提起，她儿时曾与苏联领导人合影。如今，我才突然意识到这两者之间，藏有她们不知道的历史关联。我把这个发现写在了《为了和平》第二章的开头：

1957年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伏罗希洛夫访问中国时来到武汉，去了中苏友好宫、武汉长江大桥建设工地、武汉市委大院等地。4月30日下午，解放公园路市委大院门前人山人海，人们高喊中苏友好口号，挥动鲜花和彩巾欢送。一群孩子冲出人群，围到即将上车的伏罗希洛夫面前欢呼。年逾古稀的伏罗希洛夫俯身抱起其中一个小女孩，向人群挥手致意。

这一幕被苏联摄影记者抓拍了下来，刊登在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上。一时间，这个来自中国武汉的小女孩在苏联小有名气。黄宝玲回忆说：“后来，好多苏联的小伙伴给我来信。我有一个叔叔是学俄语的，爸爸就把来往信件请他帮着翻译。”时至今日，这些信件、剪报，历经风雨散失无存，但年近古稀的黄宝玲却难忘那一段最快乐的童年记忆。

伏罗希洛夫并不知道，这个小女孩就是解放公园苏联空军志愿队烈士墓总设计师黄康宇的女儿。黄宝玲老人至今也不知道，这位和蔼可亲的老者是一位资深元帅，是当年派遣苏联空军志愿队援华抗战的主要负责人、亲自部署者。

日程紧张，伏罗希洛夫来不及去一墙之隔的解放公园烈士墓祭扫，但与黄康宇女儿黄宝玲的那张完全出于偶然的合影，也许就是历史的有意安排。

以解放公园苏联空军志愿队烈士墓为起点，从《武汉志》中仅有的寥寥50字记载出发，《武汉上空的鹰》搜寻到15位烈士的准确档案信息，见到一位烈士遗孀，找到8位烈士后裔，复原3位烈士的真容，另外发现14位在武汉对日作战中牺牲的苏军烈士名单，并将他们的名字增刻到解放公园纪念碑上。2020年9月，俄罗斯驻华使馆根据普京总统令，为这一寻访报道颁发了俄罗斯国防部“纪念保卫祖国烈士功勋奖章”。

谌达军，长江日报高校新闻中心主任，
主任记者

梦想重回“大武汉”

◇ 叶 青

人物名片：叶青，湖北省民进原副主委，湖北省统计局原副局长，第十届、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现任民进中央特约研究员，国家审计署特约审计员。

武汉之大在于面积，在于经济规模，更在于城市格局。1979年以前，我没有想到自己的一生会与“大武汉”联系在一起。与武汉的交集源于小时候的一条灯谜：夏天盖被子（打一城市名）——武汉（捂汗）。1979年7月，我第二次参加高考（第一次是1978年考上师专没有去），分数上了本科线，但是分数不高，省内的厦大、福建师大都上不了。

正值湖北潜江工作的小姑一家回福建老家探亲，就建议我到武汉读书，身边有个亲戚也有个照应，于是就填报了湖北财经学院。1979年10月入学，1983年本科毕业，

继续攻读本校的硕士学位，1986年7月留校任教。1991年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我与“大武汉”真真实实地结合在了一起。

建议成立武汉铁路局

我学的是财政学专业，因此，我的参政议政始终围绕着财政经济问题展开，包括公车改革的建议。把参政议政与专业研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在民进省委会领导的关怀与重视之下，我有了越来越多的头衔与舞台：民进中南财大支部主任、民进湖北省委会学习委员会、经济委员会主任，特别是在2000年6月，成为民进湖北省委会副主委，分管参政议政。

对武汉的经济研究，是我参政议政工作的起点。1978年，武汉GDP39.91亿元，位居全国第10位；1995年，武汉GDP607亿元，

跌落至第16位；2000年，武汉GDP1207亿元，重回第10位；2002年，武汉GDP1492亿元，再度跌至第14位。这些数据我谙熟于心。关注到与武汉相似的城市发展经验，我会找机会提出来。在我2017年辞去省民进副主委之前，影响最深的莫过于《强化武汉铁路中心枢纽建设，成立武汉铁路局》的建议。

当时铁道部决定取消各地的铁路分局，武汉铁路分局也在其中。2004年10月，民进省委接到省委统战部的一个任务，为武汉铁路分局升格为铁路局写一个有分量的报告，在2005年的全国两会上正式提出来。

12月成立了由主委蔡述明为组长，我、祝湘洲（已退休）及专家袁云光、杜耘、王学雷、廖明星为组员的调研小组。

2005年1月，在武汉铁路分局召开座谈会，分局各处室负责人、总工程师参加了会议，着重探讨了成立武汉铁路局的必要性：是形成更合理的铁路运输半径的要求；是把武汉建设成为全国重要铁路枢纽的要求；是充分发挥武汉综合交通枢纽作用的要求；是理顺铁路运输管理体制的要求；是武汉经济地位日益强化的要求。

在2005年1月的湖北省政协九届三次会议上，民进湖北省委提交了大会发言材料，并由副主委祝湘洲代表省民进在大会上作了发言。同年3月，主委、省政协副主席蔡述明再次和省政协副主席丁凤英等5位政协委员，联名向大会提交了《关于提升武汉铁路中心枢纽城市地位，尽快成立武汉铁路局的建议》提案，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重视。

在全国政协一次联组会上，恰好铁道部的一位副部长也在场。蔡主委争取了一个发言的机会，阐述了武汉铁路分局升格为铁路局的种种理由。当天晚上铁道部开部长会议的时候，就确定把武汉铁路分局升格为铁

路局，因为武汉的区位优势非常明显。武汉铁路局的一位同志后来对我说，这是铁道部落实最快的一个提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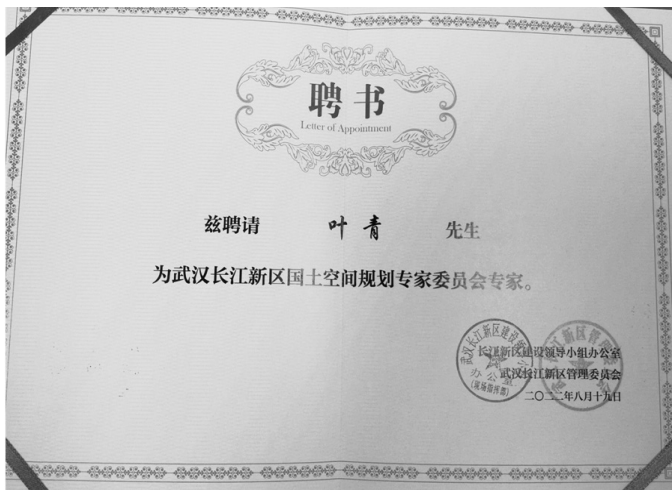
3月18号，湖北全国人大代表的车队从武昌火车站回东湖边上的翠柳村客舍（湖北全国人大代表的集散地）时，路过洪山广场边上的武汉铁路局，见到他们正在敲锣打鼓，彩旗飘飘，那个讨厌的“分”字已经去掉了，武汉铁路分局就这样升格为铁路局。把武汉建设成为铁路枢纽，这也是当年张之洞的设想。当时与武汉局一起升格的还有西安、太原。

呼吁建设汉口北新区

2001—2002年我当选为省人大常委，在随州代表团。

2000年6月，时任河南省省长李克强在郑州调研时提出，一定要增强郑州中心城市功能，加快全省城市化进程，并强调“郑州市当前面临的首要任务是扩大城市规模”。同年，位于郑州市东郊的原军民合用机场启动迁建，河南省委、省政府审时度势，提出以该区域为核心开发建设郑东新区的战略部署。2001年7月，按照河南省委、省政府“高起点、大手笔”的要求，郑州市对郑东新区总体规划进行了国际征集。2002年3月，郑州市人大对规划方案予以确认。2003年1月20日，以郑州国际会展中心开工为标志，郑东新区开发建设拉开序幕。2022年，郑东新区生产总值排在郑州第二。

郑东新区这个概念在网络上出现以后，对我的感触很大。武汉也应该有如此大手笔的规划。武汉有三镇，武昌南有光谷，汉阳西有车城，那么能够大面积发展的只有汉口



北了。之后，每一次有新区出现，我就很期盼地提起“汉口北新区”。建设2000平方公里的汉口北新区，覆盖东西湖、黄陂区、新洲区沿长江、汉江的一部分。重点是连接阳逻港与天河机场，形成“两港经济带”及武汉的“金三角”。

2010年武汉市“两会”上，我与中国科学院院士、华中科技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杨叔子等13名参事共同发起将汉口北打造成“国家级商贸区”的参事建议案。

2011年11月15日，我在博客上写了一篇文章《从天府新区想到汉口北新区》。10月26日，《四川省成都天府新区总体规划》经四川省政府常务会议审定通过。四川省政府强调，要把天府新区建设成为以现代制造业为主、高端服务业集聚、宜业宜商宜居的国际化现代新城区，形成现代产业、现代生活、现代都市三位一体协调发展的示范区，力争再造一个“产业成都”。看到这些，我觉得发展汉口北新区更有必要。

在大家的呼吁下，汉口北的经济资源越来越丰富。此后一系列市场，包括食品、家具、建材、石化、钢铁市场，沿着汉口北大道摆开。拥有30多个大型专业细分市场的汉口北国际商品交易中心，2023年市场

线上线下总交易额突破1859亿元，累计进出口总额突破178亿美元。

武汉轨道交通1号线于2004年7月28日开通运营。2008—2017年，我被聘为市政府参事，期间我极力呼吁轻轨交通过府河。2014年5月28日其汉口北延长线开通，全线为高架线路，全长5.72公里，设滕子岗站、滠口新城站、汉口北站3座高架车站，汉口北小商品市场与市中心交通更便捷了。

2017年1月，市委、市政府开始规划建设长江新城。2月，我参加市政协组织的长江新城选址工作，极力建议新城放在汉口北——武湖一带。后来长江新城果然落户于此。

目前中国有19个国家级新区，第19个是2017年4月1日公布的雄安新区。有10多个城市正在争取成为第20个国家级新区，希望武汉能够梦想成真。

2022年2月27日，长江新城更名为长江新区，由湖北省人民政府批复设立。2月28日，省委、省政府召开武汉长江新区成立大会。长江新区从500平方公里扩大到650平方公里，覆盖到阳逻港，极大地加强了长江新区的实力，这更加有利于争取国家级新区。

如今，我还是长江新区的国土规划专家委员会专家。

建议沿海产业向中西部转移

2003—2012年，我当选第十届、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照例要列席省人大会议，也是在武汉团。我在北京开会期间积极呼吁，沿海部分产业要向中西部转移，比如家具产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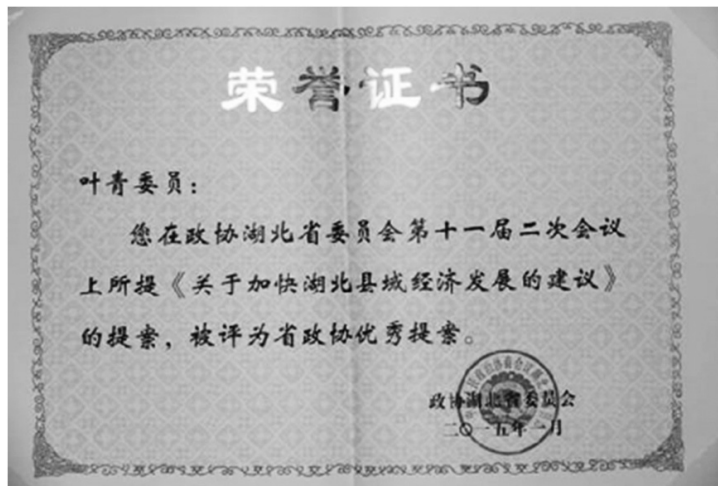
随着中部崛起战略实施，中部地区已形成以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环鄱阳湖城市群为依托的“中三角”。

2010年是中国沿海产业转移第二阶段开始的元年，以富士康内迁为标志。第二阶段的特点是自愿转移。“中三角”地区急需规划合理、理念超前的工业园区承接产业转移。在此机遇下，在“大武汉”周边建设大规模的产业园区势在必行。最终要在离武汉中心区50—100公里的环形地带形成低成本的“环武汉产业圈”。

这正如，珠三角的核心城市——广州是管理、研发和商贸流通的重镇，制造业的知名品牌并不多，但是围绕着广州的周边经济腹地，却有大量的重量级制造业城市。所以，研发、商贸向武汉集中，制造向周边中心城市扩散是一条客观规律。

改革开放前，我国家具业的中心是在京津地区和以上海为首的长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开放以后的发展使家具业向广东、浙江、东北、华北等地转移，并逐步发展成为现在的五大产业区。我国家具业的这种区域发展呈现出有别于其他国家的特点，即出现所有制和产业中心的转移并随之产业集聚的现象。珠三角及周边家具板块是目前最大的家具集群区，占中国家具总产量的50%左右。

中西部家具集群将国内的销售市场下潜到二、三级市场，应抓住良机，率先开拓农村市场，成为家具制造业的中坚力量。这其中，四川家具企业实现了异军突起，成为家具行业的先锋。2010年，全省家具行业年产值突破500亿元，同比增长22%，行业从业人员达80万。四川家具业未来五年



预期保持20%以上年增长速度，成为千亿产业。

从家具销售市场的角度来看，当时已形成六大销售市场：一是以上海为中心的华东销售市场，约占20%的份额；二是以广州和深圳为中心的华南销售市场，约占15%的份额；三是以武汉和郑州为中心的中原销售市场，约占15%的份额；四是以沈阳、哈尔滨为中心的东北销售市场，约占10%的份额；五是以北京为中心的华北销售市场；六是以成都、西安为中心的西部销售市场，约占15%的份额。

那时中部各省份十分重视把握家具产业转移的机遇。湖南省明确提出将家具产业打造成千亿产业；江西南康则致力于打造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家具产业集群，打造“中国家具之都”；河南提出发挥承东启西、纵贯南北的区位优势 and 综合资源优势，建立家具生产基地，积极培育新的增长点和增长经济带。

相比之下，湖北有优越的区位优势，汉产家具在全国红火一时。如今，产业转移给湖北带来前所未有的大好机遇，可实现后发制人、后来居上、弯道超越，最终将形成低成本、高回报的“环武汉产业圈”。

为民营企业发展鼓与呼

2013年到2022年，我当选为湖北省政协常委，在政协湖北省委员会第十一届二次会议上提的《关于加快武汉民营制造业发展的建议》提案，被评为省政协优秀提案。

第一，建立正局级机构——中小企业局，扶持民营经济。一般的省市是放在经济与信息委员会，也有的是独立。比如，重庆的市政府部门管理机构中有独立的市中小企业局（市乡镇企业局）。2023年10月，国家发改委民营经济发展局成立。武汉有正局级的中小企业发展中心，尚属事业单位。

第二，提高民营企业家的政治待遇。建议在安排企业家进入各级政协、人大担任常委之外，还可以担任政协副主席。作为财富的创造者，企业家群体应该有这种待遇。早在2003年，重庆力帆集团的董事长尹明善、浙江传化集团董事长徐传化就担任省市政协的副主席。

第三，鼓励国有民营企业合作。比如，2012年9月10日，作为央企的东风公司，引入湖北知名民企、东风商用车的龙头经销商湖北明想集团有限公司股份，重组东风云汽，双方各占东风云汽50%的股权。这就是混合所有制。

第四，依托科教、大企业发展民营制造业。武汉最大的优势就是科教，一个研究团队、一个专利，可能就是一个大产业，比如武汉有地理空间信息产业优势……这值得武汉市的领导关注。2017年武汉实施高校成果转化工程以来，效果明显。还应该开展“环大学科创圈”建设，让学生跟着老师去创业。

除此还有搭建民营经济发展平台、金

融支持——设立中小企业发展银行、鼓励有条件的专业人员下海、大学生休学创业等具体措施。

2016年7月《环球时报》向我约稿，我撰写了《让民营经济不再受歧视》，继续为民营经济发展鼓与呼。

2016年1—4月，在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0.5%的前提下，民间投资只增长5.2%。国务院派出十个调研小组到各省去了解民间投资受阻的情况。在调查报告中，民企把金融机构形容为晴天送伞，雨天收伞；优惠支持“礼包”不少，但民企享受不了。好政策往往看得见、吃不着，民企身份难获认同，明里暗里歧视政策多。一些地方干部“谈商色变”，不愿也不敢与民营企业打交道。

2015年，中国非公有制经济创造了60%左右的GDP、80%的就业机会、50%的税收，已成为中国经济稳增长、调结构、促就业的重要支撑力量。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日益成熟，公私经济应在各自领域里发挥不同作用。如何改变目前民营经济受歧视的局面？我在文中提出三点建议：

一是把民营经济发展与投资环境改善列入地方政府考核目标；二是在宣传口径上对公私经济一视同仁，特别是要多宣传民营企业中的纳税大户；三是在表彰纳税人、落实金融支持等优惠政策时不要搞三六九等。

以上为我1992年以来成长道路上几个参政议政的片段。在各级领导的支持与关心之下，我有幸拥有越来越广的参政议政舞台，为“大武汉”的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微薄之力。希望我的参政体验，对年轻一代党外知识分子有所借鉴。

“江湖水生鸿雁来” ——诗文中的苏东坡与鄂州（下）

◇ 夏建国

武昌辞行：别大江两岸友人

元丰七年（1084）三月，宋神宗“量移汝州”的御札传来，为苏东坡贬谪黄州、扁舟武昌这段特殊经历画上了句号。告别辞行之时，苏东坡对武昌流露出深沉的不舍之情。

四月初一，住在东坡附近的黄州父老在雪堂为苏公饯行，东坡写下令人动情伤感、带着浓浓告别意味的《满庭芳·归去来兮》。词尾吟出“仍传语，江南父老，时与晒渔蓑”，表明在黄州贬谪生涯中，大江两岸，包括武昌在内的江南朋友，在他心中留下深厚感情。

四月初七上午，苏东坡登舟离开黄州，在樊口滨江码头，他以二首《调笑令》赠别武昌友人。“归雁，归雁。饮啄江南南岸。将飞却下盘桓。塞外春来苦寒。寒苦，寒苦。藻荇欲生且住”，表达出依依难舍之情；在西山吴王岷，他望着已经逐渐远离的贬谪之地，作《过江夜行武昌山上闻黄州鼓角》，向在座朋友表示“我记江边枯柳树，未死相逢真识面。他年一叶溯江来，还吹此曲相迎钱”；在车湖刘郎洑，以《再书赠王文甫》“今日无风，可去而我意欲留”的诙谐幽默之语，表达对“二王”兄弟等武昌友人不愿离别的情感。

据孔凡礼《苏轼年谱》载，随后苏东坡先到兴国（今黄石阳新县）拜访好友杨绘，

然后于十四日来到磁湖、西塞山（历史上为武昌县属地，明代析出），跟武昌、黄州诸友告别。在磁湖，苏东坡看到了苏洵写给吴子上之父的墨宝，留下《跋先君送吴职方引》。接着与友人一起游览磁湖“陈氏草堂”，记下了这次游览中的情趣；在西塞山江畔，苏东坡吟出“斜风细雨到来时，我本无家何处归。仰看云天真簪笠，旋收江海入蓑衣”，使送行的大江两岸友人真切地感受到自己已由贬谪戴罪之初的抑郁落魄，逐渐向超然豪放心态的转变，以及山川地理绝妙、人文风情浓郁的古武昌，对逆境升华的苏东坡产生的慰藉助推。

《武昌西山》：玉堂奏响唱和交响曲

元祐元年（1086）九月，回到朝廷的苏东坡与曾任武昌县令的邓圣求同在玉堂当值，两人都对武昌有着浓烈的思念之情。苏东坡率先写出《武昌西山并叙》，邓圣求当即以《次子瞻〈武昌西山〉韵》和之，而后苏辙、黄庭坚、晁补之、张耒等纷纷次韵。对诸贤众杰踊跃参与此次唱和并形成引起朝野轰动的这一骚坛盛事，苏大学士感到万分荣幸，作《〈西山〉诗和者三十余人，再用前韵为谢》，其后将收集到的唱和诗委托车湖“二王”刻于西山石壁之上。

《武昌西山》玉堂唱和之所以能形成“阳春一奏众争和，咸韶荡默群仙来”的盛况，除了苏东坡在北宋文坛的巨大影响力外，还因为诗中牵涉到他

和参与其间的众贤儒在乌台诗案中的命运起伏，勾起了次韵、品诗之人对盘桓起伏经历的回忆思考，并通过参与或关注玉堂唱和盛事互相慰藉，相互鼓励，呈现出积极的人生态度与高尚的士子精神。也因此，玉堂唱和盛举及其产生的一批诗作，不仅蕴含着非常高的艺术价值，还融汇了深刻丰富的人文价值和史学价值。

触景生情：题画赠答忆武昌

《武昌西山》唱和后的两年零四个月，苏东坡在好友王定国家中欣赏其收藏的王晋卿《烟江叠嶂图》。这幅画武当山江景的名作，让他触景生情，随后在《烟江叠嶂图》上留下《书王定国所藏王晋卿画〈烟江叠嶂图〉一首》诗并序。

该诗开篇便细致入微地描写如愁浓密



鄂州画家孟庆忠《苏轼武昌西山寻梅图》

的“云烟”笼罩着大江和江对岸的“千叠山”，以及云开雾散后一幕幕无法忘怀的那山、那岩、那泉、那川、那桥、那店、那人和那江上渔舟。这是画中之景，还是苏东坡心中所思，已无从分辨。在“使君何从得此本，点缀毫末分清妍。不知人间何处有此境”的问诘揣摩中，他又想起首游西山时“径欲往买二顷田”的夙愿。到此，“君不见武昌樊口幽绝处，东坡先生留五年”这一情真意切、萦于胸怀的十七字肺腑之言脱口而出。

接下来又以春之“春风摇江天漠漠”，夏之“暮云卷雨山娟娟”，秋之“丹枫翻鸦伴水宿”，冬之“长松落雪惊醉眠”，写尽古武昌四季江山胜景；还以“桃花流水在人世，武陵岂必皆神仙”，尽情描述古武昌如同人间仙境之美妙。面对这么好的地方，已向宋哲宗乞求外任的他，通过诗末“还君此画三叹息，山中故人应有招我归来篇”，表达拥有美好胜景的武昌就是自己外任退隐的最好“去路”之一，武昌“山中故人”应该欢迎他“归来”，这实际上是其真心想重返武昌之意。

苏东坡这首深情眷念武昌的诗和其复韵诗，以及王晋卿的复韵赠答诗并跋，构成一段北宋文坛佳话，衍生出“一幅名画”“两位大家”“四篇诗文”和“画、诗、书三绝”共存于一帛的旷世杰作。

恤农悯农：推广“武昌秧马”

“予昔游武昌，见农夫皆骑秧马。以榆枣为腹欲其滑，以楸桐为背欲其轻。腹如小舟，昂其首尾，背如覆瓦，以便两髀，雀



鄂州市博物馆收藏的“武昌秧马”

跃于泥中。系束藁其首以缚秧。日行千畦，较之伛偻而作者，劳佚相绝矣。”这是苏东坡贬谪惠州途中，向老友曾安止介绍自己在武昌见识“秧马”情形，以及其形状特点、功效所写的《秧马歌（并引）》，是存世文献中推介“武昌秧马”的第一篇诗文。

江南人种稻时，农夫多要两腿深陷泥中弯腰扯秧，一天下来使人腰酸背疼直不起身。自称“识字耕田夫”的苏东坡，躬耕时比一般农夫更加喜爱观察琢磨，他发现武昌“农夫皆骑秧马”扯秧，且“较之伛偻而作者（指弯腰扯秧），劳佚相绝矣”，于是便有了此后在江西推广“武昌秧马”的轶事。江西泰和县发现的一些文物，为考证曾安止跟苏东坡围绕“武昌秧马”所发生的故事提供了佐证。

来到惠州后，苏东坡发现这里也是水稻主产区，其农人同样是弯腰扯秧。于是他在多处推广“武昌秧马”，并一连写了四篇《题秧马歌后》，记下其在岭南和浙中、常州一带推广的具体情形。

“秧马”实际上是古武昌农人为缓解

扯秧劳累的一个小发明应用。苏东坡在《题秧马歌后四首(之三)》中曾说“此老农之事,何足云者”。但就是这一“何足云者”小事,实际上是一件有益于当地民众的大事,在经历人生磨难时,苏东坡还在想方设法到处推广,既体现了他的恤农、悯农情怀,也寄寓其对武昌的念念不忘情感。

命运颠簸:仍怀思念武昌之心

写下《烟江叠嶂图》题画诗后,苏东坡来到外任之地杭州。元祐五年(1090)秋,他跟友人赋诗唱和时,眼见这里美丽山水,不由自主地想到古武昌庾楼(又名南楼),想起李白游此楼时借庾亮“乘兴坐胡床”,以“情景南楼夜,风流在武昌”诗句述怀的雅事,当即填《点绛唇》:“闲倚胡床,庾公楼外峰千朵。与谁同坐。明月清风我。别乘一来,有唱应须和。还知么。自从添个。风月平分破。”

此后苏东坡的仕途进入了更加跌宕起伏阶段,但他那颗怀念感激武昌之心,在越来越惨烈的命运颠簸之中始终未曾改变。元祐七年(1092)九月,将苏东坡从贬谪漩涡中起用的太皇太后高氏仙逝,使他的仕途上升通道就此关闭,宋哲宗诏令其出知“重难边郡”定州。途中他作《渔家傲·临水纵横回晚靥》,用对比强烈的画面记述这段冷暖自知情感。

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词中专门写到“雪淡云凝冻”的西山。虽然此山并非武昌西山,但就像跟“西湖”有缘一样,他与“西山”也结下很深的情感,时常见之于笔端。苏东坡离开武昌后,有一次看到西边山岚苍翠,就情不自禁地写下《怀望西山》:“双峰何处白云悠,赤壁千年战未休。纵使长江

澄碧玉,谁将梅子落黄州。”也因此,后来他在定州写《中山松醪赋》,专门提及“望西山之咫尺”。

来到惠州前后,苏东坡不仅一次又一次地推广“武昌秧马”,还将寻绎樊山时对陶侃及其曾孙陶渊明的敬慕追思之情、对道家“小仙翁”葛洪养生著述的兴趣,带到生活中。因此当地人在苏东坡故居旧址建成的惠州苏东坡祠里,特意为道家仙翁葛洪、退隐诗人陶潜(陶渊明名)、旷古文豪苏轼,专门立“三贤祠”。

在人生的晚年,苏东坡被贬谪流放到“海角天涯”的儋州,所经受的禁锢迫害也越来越惨烈,再直接跟武昌诸友联系是一件非常难的事了。但他把在武昌寻访先贤逸迹所受到的启示影响,在西山寺礼佛时曾经探究的慧远净土宗理念,在武昌葛山问道时深悟的葛洪《抱朴子》等典籍理义,跟其晚年落魄时的诗文创作、修身养性、养生健体,应用自如地融合在一起,并一直伴随着他到达生命的终点——常州毗陵。

夏建国,鄂州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常务副主任,鄂州市苏东坡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

爱满江城，用汉绣传递美好

◇ 黄春萍（口述） 章旷怡（整理）

人物名片：黄春萍，市政协委员，湖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武汉市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民间文艺最高奖“山花奖”得主，国家非遗汉绣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汉绣，是流行于湖北荆州、武汉、洪湖一带的传统刺绣艺术，其文化源头可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楚绣，19世纪中叶伴随着武汉的商业化走向繁荣。2008年，汉绣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也就是在这一年，我在武昌红巷艺术城开设了“锦绣坊”汉绣工作室，开启了传承汉绣之路。

初识汉绣，编织锦绣人生

说起与汉绣的缘分，还要回溯到儿时，我的奶奶和妈妈都喜爱绣花，受到家中长辈的熏陶，在两三岁的时候，我就拿着针线绣着玩。在外面看到一些花花草草时，我也会把它们记在脑海中，思考着怎样才能表达对于这些美好事物的感受，回家后开始模仿着绣。在10岁那一年，我开始跟着武汉的两位老艺人韩辉、项珍珍学习。在学艺的日子里，每天都要练习十多个小时，手指常常被刺破。但对汉绣的喜爱冲淡了这种辛苦，辛

苦反而变成了享受，也因此练就一手扎实的汉绣技艺。

高考时，我报考了一所美术和刺绣专业的学校，毕业后就被分配到武汉绣花厂设计室从事汉绣设计工作。半年后，有一个全国刺绣研修班在汕头举办，当时武汉市二轻局有一个进修的名额给了我。在研修班老师的建议下，我又报考了广州美术学院，在广州美院服装系学习了四年。

毕业后，我本来有机会留在广东发展。90年代的广东，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各行各业都生机勃勃，吸引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年轻人。思虑再三后，我还是回到了武汉，重新回到武汉绣花厂。我想着是单位给了我这次机会，在学习期间我的工资和福利都是照发的，做人不能过河拆桥。

我一直认为每个人都是有使命的，冥冥之中就沿着自己既定的使命走下去，不管做什么，只要认真做，人生处处是机会。

回到武汉绣品公司后，我对公司机绣



黄春萍汉绣作品《屹立的国旗》

方法进行创新改良，创作出“机仿手”的新方法，让机器绣出来的作品如同人工绣品一样逼真、灵动。研发的产品一经推出即获得市场青睐，大量出口订单为公司带来了不菲收益。

但我的内心还是更衷情于传统手工汉绣，没有因为机械化的发展而扔掉这么多年来学习到的刺绣功夫。我每天依然保持10小时以上的刺绣量，在1秒钟的时间里，精准地将一根丝线劈成1/64，完成穿针引线。在坚持不懈的练习下，汉绣技艺逐渐达到较高的水平。

2008年5月12日汶川地震发生，我在电视上看到一个令人震撼的真实场景——北川中学倒塌了，唯有一面五星红旗却屹立不倒。耀眼的红色照亮了四周的灰暗，我的内心久久无法平静，决定用手中的针线为汶川人民献上一份爱心。

我花费一年时间，用568万针、800余种色线，绣制完成《屹立的国旗》，捐献给汶川地震博物馆作永久收藏。这幅刺绣作品凝结了我的爱心与心血，荣获第九届中国民间文艺最高奖“山花奖”，我被授予“汶川荣誉市民”的称号。这既是一种肯定，更是一种激励，不能仅把汉绣当做一门技艺、一门生意，更要努力用汉绣去传递美好、服务社会，去彰显更大的价值！

成立“锦绣坊”，助困助残展芳华

2001年武汉绣品公司改制垮掉了，此后我边陪孩子读书边创作研究汉绣技艺，静下心来绣了200多幅作品。依靠着积攒的200多幅作品，2008年我在武昌红巷艺术城开设“锦绣坊”汉绣工作室，面向社会招收汉绣学徒。



黄春萍在课上讲解汉绣技法

开汉绣工作室的初衷不仅是为赚钱养家，也是想保留这门技艺，让更多人认识它、喜欢它，将它传承下去。“锦绣坊”刚成立时，招收的学员主要是一些下岗女工和贫困妇女，通过学习汉绣，她们能获得一份在社会上安身立命的技能，以此增加收入，改变自己的生活。

彭敏霞是“锦绣坊”的一名学员，跟着我学习汉绣多年。前两年，她的丈夫生病住院，病情十分严重，住院期间的花费非常大，只能四处向亲朋好友借债。尤为不幸的是，她的丈夫最终因病去世，家庭为此还背上了35万元债务。巨大的悲伤和压力，一度让她找不到生活的方向。

得知情况后，我通过微信给她转账2000元，但她没有接收。我深知小彭虽然家境困难，却是一名自立自强的女性，并不想轻易接收他人的援助。我把“锦绣坊”的学员都召集起来，一起向她下汉绣马面裙的订单，一条按2000元回购。这些虽然杯水车薪，也能稍解燃眉之急，更重要的是我想通过这种方式鼓舞她：她可以用汉绣这门技艺、用自己的劳动去偿还债务，去赡养家人，生活会越来越好的！

汉绣的传承与发展离不开社会方方面

面的支持，因此我们也要利用汉绣去服务社会，去帮助到社会上的一些弱势群体。

“锦绣坊”招收的第一个残障人士是王岚，她有轻度的智力障碍。2010年初，王岚逛街时偶然看到“锦绣坊”的店面，心生欢喜，让陪同的爸爸向我提出了拜

师学艺的想法。我也欣然收下这名特殊的弟子，当王岚的爸爸询问学费情况时，我毫不犹豫地回答：“免费！”在此之后，“锦绣坊”招收了越来越多的残疾人学员。

每当我走进教室授课时，看到她们身体上不同程度的残疾，能感受到她们每个人经历过的痛苦和心酸，看到一双双渴望的眼睛，我觉得一定要为她们做些什么。2012年，为了方便越来越多的残疾人学员学习汉绣，我在红巷的街边又开了一家店面，自费100万元开设汉绣培训基地，打造残疾人汉绣品牌。基地对所有残疾学员免收学费和材料费，年底还给残疾人学员发奖金，学成后帮助她们就业创业。

来自江汉区民生社区的吴霞光，听力一级残疾，从学员到老师，已经在培训基地呆了十多年。在接触汉绣之前，吴霞光一直在从事家政行业，身体的损耗十分严重。后来听说“锦绣坊”免费教残疾人学习汉绣，加上本身有一些刺绣的功底，便开始跟着我学习。现在吴霞光凭借着手上的汉绣技艺经常进学校、进社区授课，还在几家汉绣分店做管理，每个月有大几千的收入，生活重新焕发了光彩。

从2010年至今，“锦绣坊”已经无偿

帮助 2200 名残疾学员学习汉绣，我们这支残疾人汉绣团队人数越来越多，影响力也越来越大。学生杨君琴、周海云、杨叶叶在全国第五届、第六届残疾人职业技能大赛中获奖，并在“市民之家”登上市民大讲堂；杨叶叶、吴霞光、王岚、翟仕海分别在湖北省技能大赛中获一等奖、二等奖；学生詹萍、刘英在市残疾人艺术大赛中获一等奖；学生周海云、乌霞在汉阳区残疾人艺术大赛中获一等奖。还向文化部门推荐一名为传承人作为残疾人典型。我深知她们一路走来的艰辛，内心为她们感到骄傲。

2023 年 11 月，全国妇联和中国残联联合举办“美丽工坊”项目在全国开展，项目旨在通过选拔和扶持一批适宜残疾妇女就近就便或居家就业的手工制作企业或机构，逐步打造“美丽工坊”这一残疾妇女培训就业品牌，“锦绣坊”成为首批入选其中的 55 个单位之一。授牌仪式在武汉举行，我受邀在大会上作了发言，感谢了政府和社会各界对“锦绣坊”工作的帮助与认可，我有信心办好这个残疾人妇女就业增收的创业之家，为残疾人汉绣事业贡献巾帼力量。



黄春萍在全国首批“美丽工坊”授牌揭牌仪式上发言

结缘政协，绘汉绣传承新画卷

时代在发展，作品技艺需要创新，传承的方式也需要创新。作为汉绣传承人，如何在新时代更好地传承汉绣，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2021 年，我当选为市政协委员。借助政协这个更广阔的平台，我努力推动汉绣走出门店，进社区、进学校，甚至进戒毒所和监狱，去帮助更多的人。

在今年“两会”上，我提交《以非遗文化传承对社区特殊人群开展帮扶活动的建议》提案，建议相关部门联合设立“文化与技能帮扶”专职组织和人员，在相关政策和资金方面予以支持；组织聘请社会知名非遗文化代表性传承人和技能项目，如汉绣、剪纸、木雕、厨艺制作、摄影等专项技能；针对特殊群体集中的地方，如学校、社区、戒毒所、监狱等等，长期开展非遗文化和技能传承教育。

2021 年，为迎接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宣传汉绣非物质文化遗产，我和江汉区社区

宣传教育学院一起举办“绣万幅党旗、迎建党百年”活动。在炎炎夏日里，我跑遍了江汉区、武昌区、江岸区、东西湖区 12 条街道和一百多个社区，同社区居民们一同绣制了近万幅党旗，将古老的汉绣技艺与时代旋律相结合，让汉绣这门发源于楚地的古老艺术在新时代重现流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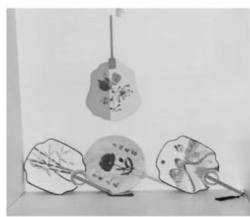
这些年来，国家高度重视文化发展和非遗的传承与保护，许多学校也开始将汉绣引

入学校课程之中，让汉绣非遗文化开始走进学校。武汉有 16 所小学专门开设了汉绣课程，由“锦绣坊”里的 20 多名学员组成教师团队教小学生们学习汉绣。

同时我们还与长江职业学院、武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武汉职业学院、武汉设计工程学院等 12 所高职院校进行深度合作，成立黄春萍大师工作室。基于我在高职学校教授汉绣的经历和相关调研，去年两会时，我同周娟、樊小伟委员联合提出《支持大学生以非遗汉绣文化创新创业项目助力乡村振兴》提案，建议对武汉高职技能院校大学生从事非遗汉绣文化项目创业给予相关政策扶持。

让我印象最为深刻的一件事情是去年五月份，在职教周活动之际，长江职业学院艺术设计学院隆重举行了非遗大师黄春萍汉绣工作室拜师仪式。仪式上，学生身着汉服向我行叩拜礼、敬茶，大家互赠小礼物，这一份份手作小礼物凝聚的是师生间的深厚情谊。这次拜师仪式拉近了我和学生们的感情，在此之后这些孩子们更愿意对我表达内心的想法。

与武汉市女子强制戒毒所、汉口女子监狱合作，也是我的一段特殊经历。面对强戒所提出“教女子戒毒人员刺绣”的请求，我虽然有过迟疑，但想到同为女性，内心的责任感还是使我同意了。令我没想到的是，汉绣学习受到了强戒所和监狱学员的热烈欢迎，比起其他类型的学员，她们专注力更高、进步更快，在汉绣学习中获得了文化传承的荣誉感，也有了回归社会后的谋生技能。



禁毒宣传扇作品
《毒·害》



汉绣作品《龙》



汉绣作品《凤凰》



汉绣作品《鸟戏花》



钩织作品《醒狮送福》

武汉市女子强戒所代表湖北参展的 5 件作品

今年 3 月，我指导并协助挑选的三幅汉绣作品《龙》《凤凰》《鸟戏花》入选了联合国会议展览，将在第 67 届联合国麻醉品委员会会议期间开展的“减少毒品需求”主题展览中展出，这对于非遗汉绣和这些失足女性而言，都是意义重大的。

回顾我的汉绣之路，这一路走来并没有看上去的光鲜亮丽，经历过许多艰难时刻，汉绣工作室也曾入不敷出。但对汉绣这门技艺的坚定、热爱，对身边残疾人学员的责任感，以及市政府和政协的帮助和支持，让我最终坚持了下来，还取得了一些成就。未来，为了汉绣的发展，我们也要走产业化的道路，将汉绣艺术与市场完美结合，真正达到汉绣生产性活态保护。

坚守“膳”心 不负“食”光

◇ 邢 云（口述） 闻 夕（整理）

人物名片：邢云，河南漯河人，武汉雅元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九三学社湖北省企工委副主任，九三学社黄陂支社主委，全国轻工行业劳动模范，武汉市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我从中国食品名城漯河而来，在武汉肉类食品行业打拼，因为生活，我不曾放弃，坚守行业三十年；因为良心，我恪守信仰，坚持品质三十年；因为责任，我不忘初心，坚定专业三十年。

食品行业扎下根

在二十世纪末的中国，能端上一个“铁饭碗”是彼时每个年轻人的梦想。1987年，

高中毕业急于分配工作的我也不例外，那个时候想法很简单，觉得民以食为天，食品部门应该不会比公检法机关差，加上家里亲戚的帮忙，就误打误撞进入漯河一家国营食品公司。

然而正值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当中，中国经济发展多年积累的诸多深层次矛盾不断呈现，下岗的浪潮席卷而来，我也未免于难，“铁饭碗”还没来得及端稳，就已经沦为广大失业大军中的一员。在短暂的迷茫后，我开始为自己谋求新的出路，别的行业也不懂，食品行业从业几年兴趣刚刚点燃，就从本行业做起吧，我决定自己干。

创业之初，生意难做。为了推销产品，我几乎跑遍了武汉大大小小的菜市场，尤其珞珈山市场、胭脂路市场，像个“男将”



邢云

一样和肉贩们打交道，他们跟我进货，一块三的肉，跟外面隔着五毛钱的差价，我净挣两毛。两毛钱是个什么概念呢，这么说吧，那个时候坐次轮渡一毛六分钱，而同样的价钱，还可以吃一碗热干面。干我们这行，吃苦耐劳是必要条件，太娇弱干不来这个。我印象特别深的是冬天，冷冻食品要装卸分切、清洗，常常是下半身都是冰水，有一次走路呼啦啦的响，低头一看，水裤子变成了冰裤子，也是那个时候，我落下了风湿的老毛病。

从市场上挣得第一桶金后，我把目标转向了高校食堂这一块，先后成为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高校的肉类产品供应商。为了采购回优质、价廉的特色产品，我走遍内蒙古、福建、云南等地。一个产品上市之前，我首先要问自己，敢拿给家里人吃吗？若能咱们再做。凭着诚信，我的客户不断增加，资金充裕了，一切就开始好做了。

2000年，我带领团队成立了武汉金信源商贸有限公司，主营生鲜肉食、冷冻肉食、

精分割小包装、熟食生产加工、销售的批发零售业务，年平均销售额2亿元，主要代理北京大红门、武汉中粮、河南双汇、山东龙大、南京雨润等大型生产厂家产品；开拓有武商量贩、中百仓储、家乐福、中商平价、武汉大学、武汉工业学院、武汉科技大学、亢龙太子、湖锦酒店等一大批优质的销售网络，成为了武汉肉类食品供应的骨干企业。

提起肉类就能想到雅元

很多人都是做批发做到不行了才想起要做商超，而我不，我更愿意注重品牌与特色，品牌意味着质量的优越，特色意味着独一无二。我要做出自己的品牌凝聚力，我们将众多肉类产品供应商区分开来，让大家一想到这个行业，就能想起我们，就能想起雅元。

2004年，我开始推出特色产品——恩施山猪肉，因为产于恩施原生态大山之中，这种猪肉肉质极为鲜美，氨基酸含量高，广受市场欢迎，而这种将地方特色农产品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的特色营销方式，也得到了恩施市政府的大力支持，山猪肉初入市场，月销量便已高达上千万。在经营模式被其他供应商效仿之后，我并没有将过多的注意力放在与他人竞争之上，而是潜下心来继续研究自己的特色。

随着快餐化时代的来临，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通过互联网进行食材采购。2007年12月28日，在主攻商超之余，我又将目光延伸到食品精加工板块，引进德国先进加工设备，在肉类产品细分细化方面进一步做到极致。2008年，我们与湖北恩施九州牧业合作推出“鲜快”牌系列冷鲜肉食品，设立小包装加工厂，制作多达30多个品种的冷

鲜肉切割品。并开始向中百便民连锁超市供应“鲜快”牌系列冷鲜肉。

2010年，注册资金2000万元，武汉雅元肉类食品有限公司正式成立。

对于肉类食品而言，通过冷链对冷藏温度进行监控，以保证其品质的优良性和食用的安全性，有着极为深刻的意义。冷链是以保证冷藏冷冻类物品品质为目的，以保持低温环境为核心要求的供应链系统，所以它比一般常温物流系统的要求更高、更复杂，建设投资也要大很多，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

经过深思熟虑后，我决定投资冷链物流，将大型物流、冷链仓储、食品加工、食品销售进一步融为一体。尔后，由雅元控股，位于湖北台湾农民创业园的台资企业武汉萃元冷链食品物流园项目开始建设和投产，项目基地占地80亩。建有鲜品分割加工间、小包装精细加工车间、熟食加工中心及冷冻库20000吨，集研发、生产仓储、渠道建设、渠道服务为一体，并建有电子商务平台和商务服务中心及冷链高端物流，这对互联

网时代雅元肉业的进一步发展无疑是一剂强心针。

2012年11月30日，武汉雅元肉类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在武汉股权托管交易中心正式挂牌场外交易。

一手托两家

民营企业想要发展，后劲很重要。我们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旗下员工高峰时四百余人，盘子之大可想而知，管理起来就是一件很伤脑筋的事情。而一听说快销食品公司，年轻人都觉得不够高大上，不愿意来。很多人说我强势能干，其实也是无奈之举。团队协作很重要，一人独大无法长远，我们需要更强大的团队。

公司管理上我实行的是“家文化”，在工作之余，我热心于帮助员工解决和安排家庭工作事宜。在办公室经常会有小朋友穿梭嬉戏，基层工人月薪就四五千元，夫妻二人收入加起来也无力请保姆，幼儿园放学比较早，下午两点多我让他们放下手中工作去

把孩子接回来，就放办公室玩耍。

每年我会给所有员工发个红包，不多也就200块钱，让他们专项用于给父母买礼物，已经坚持了20年。逢年过节给员工发福利的方式也有别于其他公司，比如每人发500块钱，以批发价挑选所需物品，公司统一进行打包，500块钱实现市场上也许1000块钱的购买力，让员工利益最大化。

付出了真心，员工才愿意向你靠拢。后方稳固了，前方才便于冲锋陷阵，全心全意投身于工



恩施山猪肉展柜旁留影

作。江湖传言“慈不带兵，义不理财”，慈和义这两样我却全占了，但效果似乎还不错。目前十年以上工龄的员工就有30多位。

保生存的同时还要促成长，为此我实行传帮带，尽量把年轻人推到前面。我们以前没有设总经理一职，去年7月1日开始，实行轮值总经理制。

平时他们只对自己的版块负责，但是在做决策的时候，大家一起商量，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决策上只要充分论证了，他们觉得没问题就放手做，哪怕错了也没关系，我来托底。每个团队轮值做一个月总经理，负责把各项工作督促到位，承担相应的责任，但这个责任不让白承担，一个月加3000块钱。每个人都有巨大的潜力，就看怎么激发，天下无无用之材，无论是金子还是铜铁，放对了位置，就都能发光。

2013年，我女儿问我：“你领着400多人的企业一年赚的钱还不顶我同学爸爸倒腾两套房赚得多，你是对食品行业有执念吗？”我在这个行业37年，多少寂寞都守住了，期间有很多机会转行做房地产开发商、做金融、做建筑商，我都忍住了。老话说人过三十不学艺，我对学习新事物有足够的信心，但总有些行业需要人去坚守。

食品行业门槛低，乱象多，竞争非常激烈，放弃底线就能赚到钱，但我的良心不允许，我追求的是上限，上限是大家想而未必能，这条路固然艰辛，但能给我内心安宁和喜悦。

大环境很艰难，这个时候，不是要考虑赚多少钱，而是在想怎么养活公司。降本



武汉萃元冷链食品物流园

增效、加强管理、开源节流、寻找突破口等等，活得辛苦一点，工资低一点，都是想挺过这一两年，用时间换空间，让公司生存下来，让团队不失业，大家小家都要托起。

莫以善小而不为

医者父母心，做食品者良心。食品安全问题一直都是国家和社会关注的焦点，食品安全问题，说到底，其实是人心的问题。莫以善小而不为，莫以恶小而为之。法律更多的是在事件发生之后产生约束和制裁效用，食品安全其实更应该作为一种道德教育深入到每一个从业者的心中。

我对食品安全的理解很简单，那就是，我生产和销售的食物，我自己可以吃，自家的小孩也可以吃。

食品行业利润薄，大手笔捐赠无力承担，我就攒钱做点小公益。献爱心也有方法，以资助贫困大学生为例，要注意他们的自尊，要走进他们的内心，资助钱只能解决一时的问题，正确沟通，关心他们的内心成长，让他们有一个积极向上的思想比给钱更重要。这些孩子因为家庭原因或多或少都



被咸丰县彭家沟村聘为“名誉村长”

有点不自信，我不失时机地鼓励他们。他们对我的称呼从邢总再到邢阿姨，又到邢妈。毕业找到工作融入工作岗位，他们幸福了，我也就不再跟他们联系，适可而止。

我先后被咸丰县彭家沟村、来凤县老茶村、建始县清河村聘为“名誉村长”，村长虽然是名誉的，但事要做实。以彭家沟村为例，我们不是简单的买卖关系，而是战略合作，双方共同成立生猪供销的法人公司，利益捆绑，共享共赢，目的是做强做大。为了落实战略合作，我们已派两名员工进驻咸丰，并从某央企聘请一名管理人员来组建公司。我的期望是：通过村企共建新公司，让彭家沟村从单一的生猪养殖村，向加工、仓储、分级、包装、运输、电商销售等全产业链延伸；让更多的土特产金字招牌走出深山，走上市民餐桌。

2016年，我们投资了一个快捷菜、成品菜项目，现在叫预制菜，2023年国家一号文件说是要推广预制菜，而我在2016年就开始着手了。我们与台湾最大成品菜生产

商台湾佳佳农产品实业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准备大干一场，可惜因为太早了，风口还没到，面对这一新事物武汉市场接受程度很低，当时就是一种进退两难的状况。“经营企业如逆水行舟”这句话我是有切身感受，不生产，巨额的投资打了水漂；生产，又得面对每个月大笔的亏损，在挣扎了两年多后，我们关停了这一项目。

这番尝试让公司元气大伤，毫不夸张地说差一点就死过去了，我也生了一场大病，庆幸多年前欠我们钱的客户把钱还了，让我们艰难地爬了起来，这也算是福报吧。

企业经营的辛酸太多太多了，积极的心态和韧劲不可少。企业家最大的破产不是财务破产，而是精神破产。失败并不意味着浪费时间和生命，这往往意味着自己有可能更好地拥有时间和生命。

从《姚锡光江鄂日记》看刘鹗争办卢汉铁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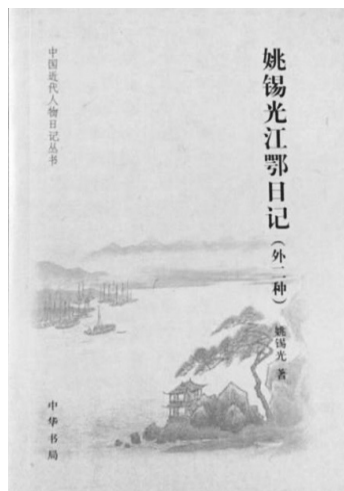
◇ 刘 飞

清末著名小说《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曾试图承揽卢汉铁路建设项目，其具体过程淹没在历史尘埃中。《姚锡光江鄂日记》（中华书局，2010年7月第1版）以亲历亲见的书写，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历史细节，有助于了解张之洞兴办卢汉铁路的相关背景与过程。

刘鹗与姚锡光

刘鹗（1857—1909），江苏丹徒（今镇江市）人，寄籍山阳（今淮安市淮安区），清末小说家、社会活动家。原名孟鹏，字云抃、公约。后更名为刘鹗，字铁云，又字公约，号老残。在《老残游记》上署名“鸿都百炼生”。刘鹗师从太谷学派南宗李光炘（龙川），终生主张以“教养为大纲，发展经济生产，富而后教，养民为本”的太谷学说。《老残游记》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名著之一。

刘鹗博览群书，对文字、数学、医学、水利、算学都有研究，其甲骨文著作《铁云



藏龟》是最早将甲骨卜辞公之于世的著作，另有藏陶、藏印、琴谱等传世。刘鹗精通音律，是广陵琴派的传人，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四大名琴之一——唐琴“九霄环佩”，就是他的藏品。刘鹗还曾为琴师张瑞珊刊刻了“十一弦馆琴谱”。目前，学界对刘鹗的研究还不充分。

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期间，刘鹗自费买米赈济灾民，却被清廷贬戍伊犁，曾以行医为生。从光绪十四年（1888）起，刘鹗先后给河南巡抚吴大澂、山东巡抚张曜做幕僚，

因帮办治黄工程成绩突出，被保荐到总理衙门，以知府衔任用。

刘鹗长期在负责外交、洋务、军备等事务的总理衙门做事，熟悉中央和地方官场。而且，刘鹗的父亲刘成忠（子恕）与位高权重的王文韶、李鸿藻等人是同年进士，关系密切。刘鹗因此能够成为英资企业福公司的买办。在王文韶、李鸿藻等人的关照下，刘鹗帮助福公司在山西取得了开矿权，任福公司山西矿产经理。豫丰公司、四川麻哈金矿、浙江四府煤铁矿等，都有刘鹗的参与。

姚锡光《江鄂日记》约十万字，始于光绪二十一年十月十二日，止于光绪二十二年九月二十日（1895年11月28日至1896年10月26日），几近一年。日记初始之时，姚锡光往谒张之洞，被留驻南洋筹防局任事，即随德国来华军事教官勘察南洋炮台。光绪二十一年末，张之洞卸两江总督之任移节湖广，姚锡光因曾在李鸿章治下的天津武备学堂执教，遂被张之洞邀往湖北，委以武备学堂总稽查之职。在此期间，姚锡光两度随洋员勘察东海及长江下游炮台，参与了湖北武备学堂整个筹办过程。

刘鹗与姚锡光是同乡，刘鹗抵汉后即过访姚锡光。因之《姚锡光江鄂日记》（以下简称《日记》）所记，为刘鹗争办卢汉铁路之事补充了相关史料的缺失。

刘鹗与张之洞

1895年前后，刘鹗得到重要信息：一度被搁置的全长1214公里的卢汉铁路建设项目又要启动。此铁路由张之洞于1889年奏请修筑，因资金短缺停工。后受中日甲午战争刺激，清政府有官员提出“应以蠲除痼疾，力行实政为先”。1895年7月，清政

府谕令总理衙门：“兴修铁路为方今切要之图，亟应举办。”

卢汉铁路仍分南北两段建设，分别由直隶总督王文韶、湖广总督张之洞负责，清政府限以三年必成。清政府每年仅能拨给的200万两工程款，还被北洋大臣李鸿章以“俄患日亟”为由挪去修筑东北关东铁路了。

因为资金短缺，清政府破例允许卢汉铁路商办。1895年12月6日，清政府谕令：

“至由卢沟南抵汉口干路一条，道里较长，经费亦巨，各省富商如有能集股千万两以上者，著准其设立公司，实力兴筑。事归商办，一切赢绌，官不与闻。如有成效可观，必当加以奖励。”只是定了一道门槛：有能力拿出1000万两银子，才有资格承办。基本符合条件的有四人：广东在籍道员许应镠、广东商人方培堉、监生吕庆麟和刘鹗。“验资”是必要的环节，由王文韶和张之洞负责。

刘鹗虽然有王文韶作为后台，但也担心张之洞反对“集洋股”，因为他所谓的1000万两银子，正是上海履祥洋行开具的一份“存款证明”。刘鹗到天津找有官场“琉璃球”之称的王文韶帮忙。王文韶却让刘鹗去汉口找张之洞。同时，王文韶还给张之洞写信，先说应标的这四人里“许、方、吕三人皆有洋东在其身后，洋东皆觊办铁路之人”，后又说刘鹗也“渺茫”，相当于否决了其他3个投标者，对刘鹗既没有否决也没有肯定。直隶海关监督盛宣怀曾向王文韶询问刘鹗的情况，王文韶则表示“不知其人”。

1896年3月，刘鹗拿着“存款证明”来到汉口，受到了湖广总督张之洞接见。张之洞十分怀疑刘鹗的实力，在刘鹗到汉口之前，就给王文韶写信说：“有银行具保者，岂外国银行肯保华商千万巨款耶？”张之洞为审查“存款证明”，向上海道去发协查

公函。上海道核查后向汉口复函：“该行在沪系伊独开，专造匹头生意。刘鹗系素识，曾与商议，如禀准有承办卢汉铁路明文，由伊行转向外洋凑借一千万两，非真有股本存在伊处。现既未奉有核准明文，伊更不便签押保认等语。查刘鹗在别埠有无召股本，未可知。惟履祥洋行开设未久，局面不大，纵使转借洋股，恐亦未可靠。”这份复函揭示了刘鹗争办卢汉铁路的真相：先把工程揽下来，再向外国银行贷款。

姚锡光《日记》提到刘鹗已是6月27日：刘云抟鹗太守来拜。姚锡光与刘鹗不仅是丹徒老乡，还与刘鹗的哥哥刘味秋是“甲戌岁同案入学”同学。

《日记》记述了刘鹗来汉的目的：“云抟现以承办铁路事来鄂见香帅。盖中国将创办铁路，去年赴军务处禀请承办者四人，一刘、一许、一方、一吕，刘即云抟也。”接着介绍了刘鹗的主要经历：云抟才气甚大，前以同知曾办山东河工，见知于张勤果公。经勤果保奏，送部引见，后积劳荐保知府。

《日记》介绍了卢汉铁路项目缘起以及刘鹗的努力：自前年秋冬之交即经营中国开铁路事，往来津、京、上海间，外商洋人，内谒当道，南北奔驰，再历寒暑。现适朝廷决计开办是事，命直隶王夔帅、湖督张香帅两制军督办，遂许刘、许、方、吕四人禀请承办之事发即（该）两制军核定。故云抟来鄂见香帅取进止焉。

《日记》详细记录了刘鹗与张之洞见面的时间、地点和谈话内容：云抟于前日已见香帅，帅询以已经集股有着之款几何，云抟对以：“已集有一千万两。”帅谓：“现拟办之卢汉铁路非一千万两所能济。”云抟谓：“现在请办者四人，每人集股一千万，则卢汉铁路之事济矣。”帅意不以四人合办

为然，因询以：“汝已集股一千万，尚能多集否？”云抟对以“铁路乃有利益之事，开办以后，股分必旺，不患无股分”云云。因将上海履祥洋行所保一千万华股保单呈上。帅云：“姑留阅，尔候定夺。”故云抟于此候进止焉。

这段日记记载明确，刘鹗和张之洞见面时间是1896年6月25日前后，地址在武昌总督府内，对话围绕资金数额和不足部分如何筹措展开。因没有定论，刘鹗留在汉口等候消息。

张之洞与盛宣怀

刘鹗不知道的是，张之洞已就审查竞标者一事正式复函总理衙门，结论是“四商皆不可靠”，并建议清政府“派熟悉商务、家境殷实之员为总理”来主办该铁路，虽未点名何人，但暗中助推盛宣怀。盛宣怀那边也积极活动，清政府基本属意由盛宣怀组建铁路公司，采取官督商办模式全面承建卢汉铁路。

姚锡光是张之洞招来办理学堂事务的，但事务没有实际进展，有时间与刘鹗来往。第二天，姚锡光回拜刘鹗，并且作了长时间谈话，内容主要是品评家乡的人物。刘鹗认为陈善馥是较杰出的，可惜是“著书之才，而非治事之才”。刘鹗称许的是马建忠，“负治事之才，通达中西学术，称瑰奇而抱伟略者”，评价甚高。姚锡光从刘鹗那里拿了马建忠的作品《适可堂（斋）记言记行》而回。下午五点，刘鹗应邀至姚处小酌，“复畅谈时事”。此处甚关紧要，就是刘鹗到底有没有一千万。

刘鹗想要承办铁路，是从履祥洋行借的洋债，立有一千万合同。刘鹗解释说：“洋

债可借，洋股不可招。洋债，不揽我铁路利权；一招洋股，则利权尽入彼掌握矣。”姚锡光表示赞同，并提出以洋债为本金开办银行。刘鹗回答：“此事余筹之久矣。”且在上海已经和马枚叔（建忠）约好，如果以铁路资本先立银行，银行就由马建忠主持。不仅如此，铁路建成以后，还要开办五金、煤炭诸矿，还要开冶炼厂……姚锡光又说，现在要开的卢汉铁路是干线，以后的支线，应当先开川楚铁路……刘鹗表示赞同，对姚锡光说：君能认办此事，余当助君集股……两个老乡一起畅想未来，颇有志同道合之意。

两人还一起“泛论世局”。姚锡光认为，中国必须尽去鸦片烟毒、时文毒，否则“诸政无从下手”“当督抚，非将李相之聪明、香帅之规模、右帅之坚实合为一人，而上有秦皇、汉武帝、元世祖之君，不能宏济艰难”……对此悲观想法，刘鹗也表示赞同。当晚一起吃饭喝酒的还有张之洞的重要幕僚钱念劬（钱恂，钱玄同长兄、钱三强伯父）等五人。

刘鹗在汉口待了两三个月，未免着急。7月1日，姚锡光冒雨拜访，刘鹗正在草拟“上制府言铁路禀”——也就是给张之洞写关于铁路建设的信，姚锡光帮他改了几处内容。7月5日，二人在花堤“纵谈时势”，姚锡光因而询问关于王文韶的为人。刘鹗说：人称夔帅为水晶顶子，言其亦明亮、亦圆滑，物小而坚也。并说王文韶其实更适合做“军机章京”等京官，可朝廷却让他到地方主政。

7月9日。刘鹗到姚锡光处，想咨询钱恂关于张之洞对于铁路承办者的最终决定。恰好钱恂也到了。钱恂告诉刘鹗，张之洞准备由盛宣怀（杏荪）督办铁路，由军机处奉旨交办给刘、许、方、吕四人，各自分段承办，很快就会有结果了。



《老残游记》作者刘鹗

姚锡光在日记中说，“盖以刘、许、方、吕四人认办，不过有其名目，实则专任盛杏荪也。盛杏荪之认办湖北铁厂，本意在铁路，今果入其掌握。”明确说出了合办是假，给盛宣怀是真。并认为盛宣怀“认办湖北铁厂”是其承办铁路的手段并且达到了目的。对盛宣怀善于“据利权”表示不满，却又赞叹其“气魄”。胡思敬在《国闻备乘》中也有同样的说法：“之洞办武昌铁政，亏空过百万，方窘迫，莫知为计。宣怀至，许为接办，任弥补。之洞大喜，遂与文韶合疏保荐宣怀为督办卢汉铁路大臣。”

7月10日早晨，钱恂、刘鹗、姚锡光一起出游，作“洪山之行”。午饭后散去。12日，姚、刘二人畅谈。13日，刘、姚“久谈”，在钱恂处吃晚饭。14日，姚往刘处“晤谈”，并且请刘将自己所绘制的《长江下游炮台图》转托其幕僚徐锡卿带往上海石印。16日，姚拜访刘未晤。17日，姚给刘写信，告之张之洞已经批准他请假回家。

由此推测，约是刘鹗见承办铁路没有

定论，所以请假暂时回去。中午时分，刘鹗到姚锡光处告别。18日，姚锡光为刘鹗送行。刘鹗约姚锡光择日到汉口宴会。19日，刘鹗委托姚锡光代为邀请钱恂、陈省三、叶浩五在汉口聚餐。21日，姚锡光赴刘鹗之约，在孙祖阁前朱姓酒家喝酒。后刘鹗乘轮船前往镇江。

刘鹗二次赴鄂

8月7日，姚锡光接到张之洞传见的消息，等到“饥欲死”也没见着。张派邹元辨问姚锡光关于刘鹗的“家世及伊人品若何？”。姚锡光作了实事求是的回答。又问刘鹗请办铁路，究竟是洋股还是华股？姚锡光答，刘鹗所筹集的资金里面有中国人的股份，只是不足数额，所以借有洋债。洋债不是洋股，洋债可以还，洋股不能还。等到铁路开办了，参股的中国人多了，洋债就可以逐步还掉了。又问：刘鹗凭什么能借到一千万洋债？姚锡光告之刘鹗在老家“家世甚好”，是刘子恕（成忠）的公子，其父做过河南省开归陈许道按察使。刘鹗曾经在山东巡抚张朗斋（曜）手下办理河工多年，是经张曜保荐升为知府的。

邹元辨将问话情形逐一回复张之洞，“往反数四”。最后，张之洞命姚锡光打电报招刘鹗迅速来湖北。姚锡光立即打电报到淮安，“召云转”。

日记中，姚锡光详细分析了张之洞再次召见刘鹗的原因。

张之洞准备让盛宣怀承办卢汉铁路，怎么又想起刘鹗来了呢？还这么着急？姚锡光又探听消息，原来是盛宣怀要价太高。张之洞在湖北开办铁政局，亏损多年，难以维持。张之洞让盛宣怀来湖北，招集商股承

办铁政（汉阳铁厂）。当年四五月间，盛宣怀到了武汉，就提出必须承办卢汉铁路，否则不能接手铁政局，因为铁厂产的钢条没地方销售。不仅如此，还将接受湖北铁政和卢汉铁路之情电告夔帅王文韶，提出：承办铁路，必须由张、王二人上奏朝廷，由其督办，如同胡云楣督办津卢铁路。还要求张、王二人上奏朝廷请开国家银行，也由盛督办，便于招集铁路股份。两件事若不应允，盛宣怀便不承办卢汉铁路。

姚锡光分析说，一旦经过朝廷授权，盛宣怀就成了督办铁路大臣的钦差，不再受地方督抚的制约。开办国家银行，必然要有“官本”即国有股，一旦到了盛宣怀的手中，国有股必被逐步侵吞而变成私人股，变成盛家的私产，就如同招商轮船、中国电报等产业一样。这就是“害则归公，利则归己”，盛宣怀的想法危害甚大，不得不加以限制。

张之洞见盛宣怀“嗜利无厌，要求无已，颇厌苦之”，所以又想到了刘鹗。让刘鹗再次来鄂面议。一是刘鹗能不能先领受湖北铁政局的事。张之洞认为，盛宣怀申办国家银行若不被允许，就一定会推掉湖北铁政。二是刘鹗到底招集了多少“华股”。张之洞的意见，洋债可以借，但中国人的股份必须达到总资本的五分之一，才能着手建设。所以，要当面弄清楚刘鹗手中华股的确实数额。那么，才能确定卢汉铁路由盛宣怀还是刘鹗承办。这就是张之洞让姚锡光电召刘鹗的用意。

第二天，张之洞又让钱恂到姚锡光处，再次探讨刘鹗承办卢汉铁路的可能性。如果刘鹗不能承办，就归盛宣怀办，盛宣怀必然坚持要开办国家银行。国家银行以国家的名义开办，利益为盛宣怀掌握，一旦破产，洋股要由国家赔偿，后果不堪设想，甚至可能

到割地偿债的地步。张之洞的担心不完全是杞人忧天，所以询问应对盛宣怀的办法。姚锡光建议，国家银行开办以后，用人权要控制在朝廷手上。

8月10日，刘鹗回电来鄂，19日即乘轮船抵达汉口，下船后冒雨到武昌。姚锡光将张之洞的用意告之，刘鹗表示“制府所询诸端，伊俱能应允照办”，表达了承办铁路的强烈愿望，并请在场的钱恂将接受之意带给张之洞。第二天，姚、刘、钱三人再次见面。21日，因张之洞要求刘鹗和钱恂、蔡毅若商量承办铁路之事，刘鹗来找姚锡光和钱恂，然后一起去找蔡毅若。

27日，刘鹗借自强学堂的地方请客，客人有钱恂等，姚锡光作陪。根据钱恂的话，张之洞将卢汉铁路派以盛宣怀、刘铁云合办，盛宣怀第二天将来湖北。刘鹗私下对姚锡光说，如果卢汉铁路由盛宣怀承办，他将与之分道扬镳，而去承办苏沪铁路。30日，钱恂和姚锡光讨论办理铁路，说：盛宣怀以为借洋债不会成功，刘鹗就认为必定成功；盛宣怀认为借洋债必须国家作为担保，刘鹗认为不需要国家担保，洋人有保险，保证创办铁路不会亏本。钱恂的意思是相信盛宣怀而怀疑刘鹗。今天看来，钱恂说的不一定是他自己的意见，更可能是之洞的意见。

张之洞召回刘鹗，本意并不是真打算让刘鹗办铁路，只是利用他来压盛宣怀。盛宣怀的消息很灵通，马上就赶到汉口，重新跟张之洞谈条件，刘鹗二次赴鄂自然不会有实质性收获。

刘鹗无功而返

9月1日，钱恂告诉姚锡光，卢汉铁路已经决定给盛宣怀承办。刘鹗等人所招集的

华股可以入股，并按照股份多少参加管理。姚锡光告诉钱恂，刘鹗不会愿意的，如果支路让刘鹗等人承办，还有可能。钱恂告诉姚锡光，盛宣怀已将铁路全部包去，不论干线支线。如果将支线给刘鹗等人承办，盛宣怀又不愿意了。就连入股的事情，盛宣怀也是在张之洞的压力下才同意的。姚锡光感叹道：“盛杏荪之垄断把持，而制府之甘受挟制，亦一奇也。”下午，姚锡光去见了刘鹗。3日，刘鹗来见姚锡光。4日，刘鹗到姚处辞别。下午，姚锡光为刘鹗送行。两个老乡未能得偿所愿，难免一番依依故人情。

姚锡光在《日记》中写道：铁云以办铁路来鄂，不得志，将往沪即午后启行。

9月22日，姚锡光发电报给在上海的刘鹗，告之张之洞上奏折让盛宣怀承办铁路已经得到批复。下午，姚锡光给刘鹗写信，告之“湖南冶炼矿质，四川开办矿务，可集股往办诸事”。第二天，姚锡光又写了与刘鹗结拜的“盟谱”，和信一起寄给刘鹗，同时寄“湖南银砂一包”。

刘鹗临行前，登上汉口龟山脚下的伯牙台作诗一首，可谓情景交融而又苍凉无奈：“琴台近在汉江边，独立苍茫意惘然。后世但闻传古迹，当时谁解重高贤。桐焦不废钧天响，人去空留漱石泉。此地知音寻不着，乘风海上访成连。”

刘飞，江苏省淮安市纪委监委派驻第二十纪检监察组副组长，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在读

江汉关究竟何时“开”关

◇ 张胜林 范 榕

今年是江汉关大楼建成 100 周年，社会各界对江汉关历史都较为关注。

江汉关是适应汉口开埠而诞生的新事物。1861 年汉口开埠，是武汉发展史上划时代的大事件。所谓开埠就是向世界开放市场，汉口港成为国际贸易大港大码头，促进了武汉三镇向现代城市迈进。武汉在由旧式商贸重镇转变为现代商都的同时，又带动了长江中游多个省份乃至西北地区的商业繁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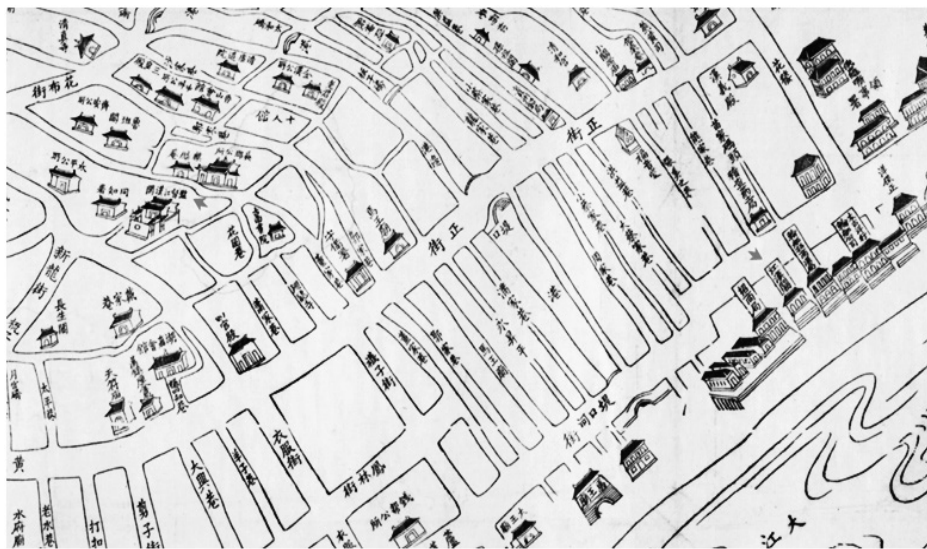
现代贸易不同于传统的“袖笼子买卖”，是以契约和规则为支撑和约束的经济形态。欲使商业贸易正常运转，必须有专门的专业的机构来监督之，于是现代海关成立就是题中之义了。汉口开埠，江汉关设立就是必然的了。因此，江汉关就成为武汉历史研究者必须重点关注的对象，江汉关成立时间也理应成为武汉史志界必须明的史事。

武汉史志界有关江汉关设立时间诸说

众所周知，有关江汉关史的研究，已有多重史志著作涉及甚至专门论述。按理，江汉关何时开设，应该不成问题也用不着笔者多费笔墨。但是细细察核相关史述，会发现这一问题并未彻底解决，尚无一个统一口径的公论。

1996 年出版的《武汉市志·对外经济贸易志》中称“1862 年 1 月 1 日设立江汉关”；市方志办编撰的多个年度的《武汉年鉴》在回溯武汉历史时都用了这样的表述：

“1862 年 1 月 1 日设立江汉关，并于次年正式征收关税。”而 2016 年市志办《武汉备要》又有了更进一步的说明：“经清政府同意，汉口于 1862 年（清同治元年）1 月 1 日设立江汉关，查验货物和征收子口税。又



1877年《湖北汉口镇街道图》中的江汉关和江汉关监督办公地(箭头处)

经清政府同意，江汉关于1863年1月1日开始全面征收关税”（按：将1862年1月1日注为清同治元年，不确。此日相当于咸丰十一年农历十二月初二）。但同为志书，表述并非一致，更早出版的《湖北省志·贸易》言：“江汉关于1862年起正式开关，执行货运监督稽查任务，1863年1月1日起开始征收关税。这标志着武汉直接对外贸易的开始。”此处有“正式开关”说法，是因为该志前面说到：“1861年9月，湖北总督官文奏明清廷，为了督办汉口华洋交涉事务，成立江汉关。”此处说到9月，但叙述模糊，是官文上奏时间？还是成立江汉关的时间？不详。《武汉租界志》《武汉市志·大事记》与也都使用了1862年1月1日“正式开关”一说。由此数例可知，武汉方志学界对于江汉关设立时间，基本上是取1862年1月1日设立或正式设立说。

笔者再检相关史籍，又看到一些不同说法。1992年出版的《湖北农业开发史》中如是说：“1861年8月，江汉关设立。次年1月，汉口正式开埠。”这里说的是

1861年8月江汉关设立，且设关在前，（正式）开埠在后。由湖北史学界专家编写的《湖北通史》，其中著名近代史家罗福惠《湖北近代史卷》述：“1861年11月11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王大臣终于同意官文奏请的《汉口设关收纳洋税折》，任命汉黄德道监督税

务。1862年1月1日，江汉关终于得以建立。”

（罗作通常注明史料出处，此处未能注出）

而2018年出版的《认识武汉》一书这样说：

“1861年11月11日，总理衙门议准官文之请，在汉口青龙巷设江汉关，于1862年1月开始征收关税。汉口开埠和江汉设关是武汉市沦为半殖民地的标志性事件，同时也是武汉由封闭走向开放的开始，江汉关的设立，将武汉与外部广阔的世界联系起来，武汉由一个相对封闭的内陆城市向国际化大都市转变，武汉在全国开放口岸中的作用和地位也日渐重要。”此当沿用罗说又有补充，但与罗说也有区别，罗言1861年11月11日朝廷同意设立江汉关。的确，若果本日常朝廷批复同意设关，相关的文书驿递传达到湖北，尚须时日（当时无电报），不可能当天就设关。

由上可知，有关江汉关设立的具体时间，至少有1861年8月、1861年11月11日、1862年1月1日诸说。孰是孰非？由是看来，江汉关何时设立还真是一个有待进一步考详的问题。

官文奏折与晚清第一手文献史料的相关记载

笔者在查阅数种武汉史志界的有关叙述时，发现一个共同的缺陷，即诸家都是作者“径直言说”，没有交待史料出处。因此本文还不得不从晚清原始第一手文献史料处着力。

1.《清史稿》咸丰八年、同治九年设关两说。

《清史稿》卷64《地理志》“湖北汉阳府”条：“自咸丰八年（1858年）辟商埠，设江汉关。汉黄德道自黄州徙驻。”此段文字中一个“自”字，透露出作者表达的并非一个静态时间点，而应是由咸丰八年《天津条约》规定汉口辟为通商口岸讲起，而非认定江汉关于本年设立。同书卷125《食货志》“洋关”条：“（同治）九年（1870年），设江汉关，裁三口通商大臣。”此处江汉关三字疑作者笔误，当为它关。

2.1861年初夏前汉口通商事务已委人办理。

咸丰十一年四月十六日（1861年5月25日），湖广总督官文向朝廷上奏称：“英法美等国来楚通商，事属创始，稽查弹压商办一切，均关紧要。必须遴委大员驻居汉口专司经理，以期妥协。”派谁合适呢？官文又言武昌省城“司道”官太忙且与汉口隔江不便，而汉口本属汉黄德道属地，但此道台衙门尚在黄州府，离汉口也太远，“碍难兼济”，故临时任命盐运使銜、湖北补用道张开霖负责相关事务，委令“稽查往来外国船只货物，委办通商开贸一切事宜”。为了张氏办理业务方便，又“发给木质铃记一颗”（《宫中档咸丰朝奏折》，原文书今藏台北

故宫博物院）。通过官文奏折内容，知此时尚无“江汉关”名，但临时管理通商事务的张氏到任了，铃记即小印章也已持有了，由是可知此时虽无“关名”，但办理“关务”的临时机构业已成立，有官员，有小印章，可以办理“通商开贸一切事宜”了。我们知道，清朝新立的衙门均须由朝廷颁给“关防”，这张氏所用只是“铃记”，就带有临时性质。但此临时性质的机构，在外省官府人看来竟是江汉关已然成立了。

与官文奏折同一天，浙江巡抚上奏朝廷，称本地洋商洋货骤增，有关通商管理和稽查税务事应有专门机构办理，请求“循江汉关例”设立海关。当时中国的正式海关有上海、广州、厦门、福州等多处，浙抚单独将江汉关拎出来比拟说事，是请求朝廷设立与江汉关同类性质的临时的非正式海关。只是笔者不太明白，汉口的商务管理机构有之，但没有“江汉关”这个名称之相关记载，反而是远在浙江的官员援引“江汉关”一名，这是传闻有误还是别的原因呢？联系下文官文奏折中内容当有所分解。

3.1861年10月2日官文奏请于汉口设关。

咸丰十一年八月二十八日（1861年10月2日），湖广总督官文上奏朝廷，请求在汉口设关，内容重要，故将原折全文大部转录：“奴才官文谨跪奏，为请于汉口设关收纳洋商进出口各货税课以严稽查而绝弊端、仰祈圣鉴事。窃照英法各国来汉口通商，节经奴才将历次办理情形奏报在案。嗣察英国参赞巴夏礼续增十条内第七条所载‘凡进出口货物均归上海稽查纳税’，实有心取巧、预萌欺弊偷漏之端，察半载以来洋商往返贸易凡有洋货进口售卖内地、内货出口贩运外洋者，因自今春二月以来发逆上犯，向在汉

口巨商大贾迁移一空，所到洋货皆于汉口各行中暗中以货易货，运载上船，并不交进口货物清单，亦不报出口货物数目，以至毫无稽查，其应完子口税，虽有上海来文，据该领事云先完正税然后方完子口税，即条约所载应办应察之事，一概龃龉、置之不理，且有内地奸商船插英旗、借此隐射偷漏，甚至将禁运货物如米粮木植钢铁铜铅等物装载下船，虽严飭沿江各营炮船详查，终难免私售贼匪等弊，必须设关收税，设立官行接单发货，始便稽查，到上海照单察验出口，洋货亦凭上海发单到汉开舱，则长江自镇江至九江、汉口进出口货物始免偷漏之弊。”

这一大段话主要意思为：通商以来，汉口未设关稽查，内外商人往往运送违禁物品和偷税漏税，最严重的是与“匪”通商。

“若如英使所谓出口货物仍至上海纳税，则迢迢长江千余里，随处皆可上货下货，任其自便，实存欺弊之明验也”“汉口并无监督税务司员官吏……既谓汉口为出口第一贸易之所，若不请验纳税，是出进自由，所谓严防偷漏者何在？……汉镇若不设关收税，漫无稽查，则长江上下、中原之利尽外国，自汉口以下镇江以上内地奸商亦倚托洋商任意私售私买，不特税课偷漏，亦必亏耗厘金，于筹饷大局实有妨碍”。国际通行规则为“洋商执一税不二税”，官文则依据中国实情辨明“殊不思纳税出于洋商，收厘取自华商，两不相涉。现内地商人分赴湖南湖北产茶所在购买茶叶等货，动称英国洋商雇伙，多抗不完纳厘金，似此情形则内地奸商人人皆可称为洋行雇伙，内地货物种种皆可称为洋商采办，汉口之外，山乡市镇处处皆可作为通商口岸，和约所称不逾三口之文已为虚语……惟有于汉口设关收税、明定章程，设立行栈收票发票稽查盘验……汉口为

九省通衢，行运甚广，百货丛集，其中茶叶大黄桐油等货尤为出口大宗……”。奏折下文进一步强调，汉口无关盘验，则内地商家夹带私货到镇江、上海出关，亦无法稽查，为了堵绝流弊，“请于汉口设关照海关章程将内地各货出口正税及子口税一并于汉关完纳”。奏文又建议“飭汉阳府勘择地址创立关卡，所有督办关税事务，应请添设监督一员，恭候由京简放通晓税务、深知外国商人性情之员，一俟命下之日即飭赶紧建造衙署关卡，以便稽查盘验……”。

朝廷接到奏报后，皇上批示“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妥议具奏，钦此，咸丰十一年八月二十八日”。这一日为1861年10月2日，君臣还在为设江汉关事商议，朝廷决定尚未做出，湖北地方官府应该不敢擅自提前设关立衙，换言之，到这天止，江汉关并未成设立。

4. 官文奏报1861年12月2日开关。

咸丰十一年十月十四日（1861年11月16日），官文又有奏报，题为“奏为专派道员在汉口设关收纳出口土货税银并开关日期仰祈圣鉴事”。报告第一段，是对四十多天前奏请在汉口设海关朝廷批复的复述，即“汉镇应否建立新关、统由奴才（指官文）会同巡抚斟酌情形、并令简派熟悉税务道府大员妥筹核办”，汉口设关就得到朝廷的准许了。官文奏报二事，一是任命郑兰为江汉关监督；二是“定于本年十一月初一日开关”，并称汉口开关后，凡一切茶叶土货正税即由汉口关交纳。咸丰十一年十一月初一日即1861年12月2日。

5. 1862年2月5日朝廷颁发江汉关关防。

咸丰十一年十月二十七日（1861年11月29日），宫中档中有官文上奏朝廷文，内容是请求赐发江汉关关防。11月29日下距“开关定期”的12月2日不过3天，揆

诸当时政情，应是官文忙中出错，在前一道奏折中居然未方开关必须有关防即大印事。本日奏文中曰，奉命“筹议设关稽查收税并遴派道员定期开关缘由先后专折奏报”，这“奏报”应该就包括了前述定拟十一月初一（12月2日）开关事。官文临时奏请朝廷颁发关防，但此日圣旨所批令有关部门议奏报批。换言之，到1861年11月29日，江汉关关防尚未颁发，没有关防的江汉关算不算“正式成立”？有无关防是一个机构是否正式成立的标志，因为无关防不能发布有效的正式官文书，其处事理政的权威性就不够。

又过了两个多月，同治元年正月己丑日（1862年2月5日），清廷“添铸湖北江汉关山东海关两监督关防”（《清穆宗实录》本日），由此可知本日起江汉关监督有了大印，但这天是铸印日期还是江汉关关防启用日期？不明。毕竟大印铸成从北京送往汉口尚须时日。从国家行政体制而言，这一天江汉关应该成为正式衙门了。

6. 1863 特设江汉关监督说。

《（同治）汉阳县志》卷12“公署志”：“汉黄德道署旧在黄州府城，同治二年，因委办外夷通商事宜，特设江汉关监督，改建道署于汉镇大智坊，汉黄德道郑兰督修。”这一段话亦有含糊之处，是说江汉关监督一职新设于同治二年（1863年）还是仅言汉

黄德道这年由黄州移置汉口（即江汉关监督先已有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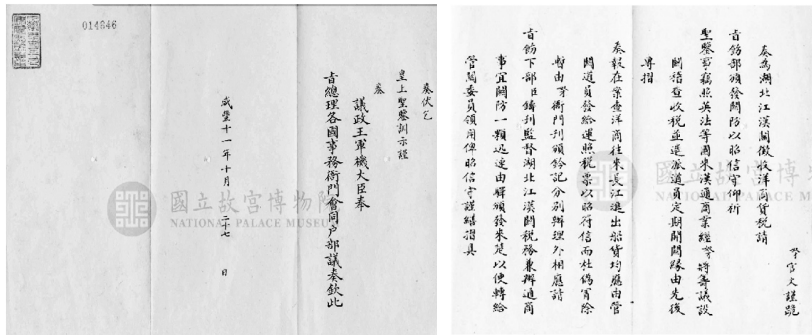
外文资料中所见江汉关开关时间

外文资料按出版地分两种，一是在中国境内出版者，一是在国外出版者。笔者检索到国内外文报纸中最早言及江汉关的报道，是1863年5月9日《北华捷报》。

1861年12月20日，英国驻汉领事金执尔给英驻华公使布鲁斯的信函中，讲述了本月2日中方在汉口一船上主办“汉口关”开关仪节，当地部分外国人应邀参加（参见《中英外交与商业关系（1860—1864）》）。这条外文资料与前揭官文奏报所定本年十一月一日（公历12月2日）开关之说完全相合。

稍后，为进一步将江汉关纳入中国朝廷的直辖体系即总税务司—税务司中，清廷总税务司赫德亲自运作，在汉口设立税务司，并遴选狄妥玛为海关代理（官），狄氏月薪银200两（出处同为《中英外交与商业关系（1860—1864）》金执尔给英驻华公使布鲁斯的报告函），汉口海关税务司于1862年1月1日正式成立。

笔者在检索诸多当年中国海关的第一手外文文献史料中，也都是以1862年1月1日作为江汉关开关的起点，如1926年上海出版的1859—1921年中国各海关历任税务司与监督名录中，就有如下的叙述：汉口商埠，狄妥玛，官衔：海关代理，月薪200两汉口银，任期开始日期：1862年1月1日，任命批文：1861年第1号，



截自台北故宫藏《宫中档咸丰朝奏折》第31辑第105页

卸任日期：1862年12月31日。次年1月1日起，狄妥玛就是正式的江汉关官员而不是代理了。

1863年出版反映1862年状况的《中国名录》“汉口部分”，有海关一条，“职员名录”中仅列一人，英文关名还只有通称 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直译为“帝国海事海关”，还没有江汉关或汉口关专名，职员中仅一人 Thomas Dick, agent，通译为“狄妥玛”。值得关注的是，本年江汉关职员只有狄妥玛一人，且非正式员工，还只是“代理”。推测此年汉口虽然有了“海事海关”，但税务司并非正式完整的海关办事机构。汉口的海关（税务司）与福州、广州等海关相比，更像是一个临时机构。两海关本年职员都有数人，且均为正式并非“代理”。这也反映出1862年江汉关税务司业务量小。如同汉口开埠初期俄国驻汉领事无专职人员，只是由美国领事代理一样，反映出当时汉口俄侨人少而事简。

资料表明，1863年江汉关又一次正式开关，狄氏由代理转为正式官员，年薪也由上年的200两升到400两。英国外事资料记载，1863年1月1日之前，中方的江汉关监督衙门因为征收洋商的过境税（汉语专用词“厘金”）引发了双方多次矛盾，缘由是条约中没有洋商必须缴纳“厘金”的规定。江汉关监督衙门引发的矛盾多，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前述狄妥玛所管海关事简的实况。

为什么中方的关督事多而洋关员事简？笔者认为，这与江汉关开关之初“一关两机构”的运作情况有关。这一情况从江汉关成立伊始到20世纪30年代就一直如此，但1862年江汉关司事机构主要是江汉关监督衙门而非江汉关税务司。1863年1月1日起，

江汉关主责由税务司承担，江汉关监督就只是一个监督机构而非具体办事机构（但关督仍然权大，并非当下各种史志所言无权无责，当另文详论）。这一天，江汉关承担的海事商事责任与上海关相同，一个完整意义上的汉口海关正式成立。这在武汉关史上是一件大事，其意义超过以前的“开关”典礼。

综上所述，江汉关初期设立（含管事）大致的时间表为：

1861年5月前，湖广总督官文已命人兼理汉口一切通商事务。

同年10月至12月，官文数次奏请朝廷在汉口设立江汉关，因为汉口通商事繁，相关关务不能全部交由上海关办理。

1861年12月2日，湖北地方官府举办开关仪式，并邀约相关洋人参加。此可视为江汉关首次设关。

1862年1月1日，江汉关税务司成立，这是通常意义上的江汉关正式开关。

1862年2月5日，朝廷颁发江汉关监督关防，关督有了大印。

1863年1月1日，江汉关税务司主持关务，江汉关履行完整全部海关职能，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完全格局的近代大型海事海关。

前述当下武汉史志界在江汉关设立时间上有多说，表述上也有初设和正式设立之分。这反映的内情是“一关两机构”运作形态前后之差，还有江汉关不同时期职能之别而已。

张胜林，原武汉晚报言论主编，曾兼任江汉大学特聘教授；范榕，旅英武汉收藏爱好者，在英国收集诸多武汉历史资料，曾在江汉关博物馆举办《另一只眼睛看世界》个人展

武汉系列童谣“三岁的伢”

◇ 彭翔华

武汉流传不少以“三岁的伢”为首句的童谣，如今四五十岁的人都还记得一些。这里的“三”是通称，虚指，用来强调年纪幼小。“伢”，武汉话一般指小孩子，如“秧子伢、儿子伢”，有时也用于长辈对晚辈的昵称，如“徒弟伢，青年伢”。“伢”，字典注音为 yá，武汉口语读如 ng á。

在表达上，“三岁的伢”多为入题或起兴，有些仅是以此作为开头，后面内容则不相干。

一百年前“三岁的伢”

“三岁的伢”是个系列，它的存在至少有百多年历史，口头流传的起始时间很难说，笔者查到的最早文字载录见于192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朱天民编撰的《各省童谣集（第一集）》，共三首，两首“栽葱”和一首“鏊磨”。

《栽葱》一：

三岁的伢，会栽葱，一栽栽到路当中。
过路的，不伸手，恁它开花结石榴。石榴肚里一棵葱，早晨开花细蓬蓬。桃花开到二三月，菊花开到九月终。金橘子，赛芙蓉，好花还是月月红。

各省童谣集 第一册
一箇糴子四隻角，解縛，脫殼，糖蔗蔗，呃得嘢嘢咽落。
這是糴子的喫法。新昌風俗：過新年的時候，必喫糯米糴。
湖北武昌
打草鞋
打草鞋，買草鞋，今年去，明年來，三兩胭脂四兩粉，走到南京折了本。
說做買賣的情形。
栽葱（一）
三歲娃，會栽葱，一栽栽到路當中。過路的，莫伸手！儘他開花結石榴。石榴肚裏一顆葱，早晨開花細蓬蓬。桃花開到三月，菊花開到九月終。金橘子，賽芙蓉，好花還是月月紅。

这首《栽葱》一，苏州振新书局 1933 年出版《中国儿歌集》中亦有刊载，文字相同。

伸手，武汉话作“搞手”，搞，c ī。伢，j ĭ n，听任，让，一作尽、准。肚里，窠里，即里面。

一口气让孩子在不知不觉中知道了“葱、石榴、桃花、菊花、橘子、芙蓉、月月红”等七种植物名称，还了解了一些花儿的开花季节，童谣潜移默化的教育功能可见一斑。

《栽葱》二，起句同上首一样，后面内容则不大相同：

三岁的伢，会栽葱，一栽栽到河当中。过路的，不伸手，伢它开花结石榴。石榴肚里一壶油，乡里大姐梳油头。大姐梳的盘龙髻，二姐梳的走马楼，三姐不会梳，一梳梳个狮子盘绣球；一滚滚到黄鹤楼。

这首《栽葱》二，见朱介凡《中国儿歌》第 90 页；陈增善、顾惠民编纂《中国民歌千首》第 221 页亦有载录。

引起小孩植物学的智慧。
栽葱(二)
三歲娃，會栽葱；一栽栽到河當中。過路的，莫伸手！儘他開花結石榴。石榴肚裏一壺油，鄉裏大姐梳油頭。大姐梳的盤龍髻，二姐梳的走馬樓。三姐不會梳，一梳梳個獅子盤繡球。一滾滾到黃鶴樓。
各書家語彙 第一編
年來了，是冤家。兒要帽；女要花；媳婦要勒子走人家；婆婆要糯米做飯巴；爹爹要肉敬菩薩；一屋大小都喂他。
小孩子過過年，是快樂的，那知過年購買一切，要特別開支；當家人不能叫苦，不好似冤家。
各書家語彙 第一編
七七

髻，j ĭ，妇女盘绕卷曲的发髻。盘龙髻又叫灵蛇髻，和后面的插花楼、狮子盘绣

球等，均为女子头型发式。黄鹤楼，千年名楼，在武昌。

第三首中的这个“三岁的伢”能干得很，会熬磨：

三岁的伢，会熬磨，熬的磨，好不过；磨的面，白不过；做的粑粑黑不过；爹爹婆婆吃十五个，胀不过，夜里起来摸茶喝，一撞撞了后脑壳；请医生，把脉摸；请道士，念弥陀，请姑娘，哭婆婆，眼哭瞎了，鼻子揪塌了。

这首《熬磨》，柳一青 1948 年编《小学国语科自修读物·儿童歌谣》第 7 页；朱介凡《中国儿歌》第 305 页上都有载录，文字基本相同。

各書家語彙 第一編
三歲的伢，會熬磨；鑽的磨，好不過；磨的面，白不過；做的粑粑黑不過；爹爹婆婆吃十五箇，脹不過，夜裏起來摸茶喝，一撞撞了後腦壳；請醫生，把脈摸；請道士，念彌陀；請姑娘，哭婆婆，眼哭瞎了！鼻子揪塌了！
詞句雖說粗淺，但因多食致病實在要使小兒知道多食的害，自己戒戒。
熬糯米
大月亮，小月亮；哥哥在街上做篋匠；嫂嫂在竈門口磨糯米；婆在房裏補褲襠；婆婆問：到糯米香，一屁打破二十四口缸。
形容年老的人食嘴。
不成材
板凳呀！劈柴，劈柴；討箇老婆不成材；愛喝酒；愛抹牌。把那紅

熬，原作“鑽（钻）”，似应为“熬”；熬，z à n，在石头上凿刻。撞，武汉话读如“cu ǎ ng”。把脉摸，即诊脉，又叫切脉、拿脉，是中医诊断病情“望闻问切”中的一种方法。弥陀是《阿弥陀经》的简称，道士当然不会去念佛法经文，此处道士应为和尚。有些版本为：“请道士，打锣钹，请和尚，念弥陀”，似乎要合理一些。揪，读如

jiū, 用手抓住或扭住。人哭的时候, 鼻涕会随之而流, 需要擤(xǐn)鼻子, 鼻子揪塌了, 是哭得很厉害的形象说法。

寓教于乐 “三岁的伢”

三岁的伢, 会打銃, 一打打个野鸡公。拿回来, 敬祖宗, 祖宗不吃, 费了伢儿的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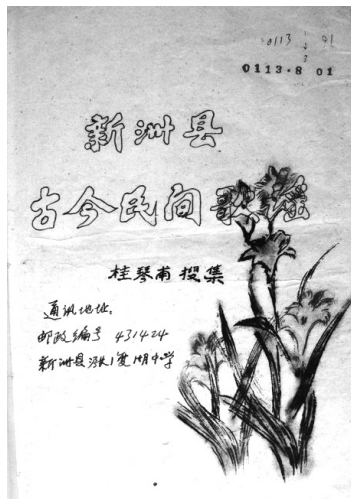
这首选自桂琴甫手写稿《新洲县古今民间歌谣》第164页, 后收录于《武汉民间童谣辑注》, 其中“三岁的伢”更厉害, 竟然会打銃。

銃: còng, 旧时用火药发射弹丸的一种火器, 如火銃、鸟銃等。野鸡公, 野公鸡, 老武汉人把公鸡叫作鸡公, 把母鸡叫作鸡婆, 这是一种主名类在前, 副名类在后的用法, 系古汉语文法在武汉方言中的存留。费了伢儿的力, 意思是伢儿的精力白费了。

这首以“三岁的伢, 会放牛”为起兴的问答式童谣:

三岁的伢, 会放牛, 一放放个花牯牛。
么花? 缎子花; 么缎? 辣椒段; 么辣? 胡椒辣; 么胡? 洞庭湖; 么洞? 老虎洞; 么老? 张果老; 么果? 水果; 么水? 糖水; 么糖? 麻糖; 么麻? 线麻; 么线? 金线; 么金? 白金; 么白? 蛋白; 么蛋? 鸡蛋; 么鸡? 雄鸡; 么雄? 狗熊; 么狗? 豺狗; 么豺? 劈柴; 么劈? 斧头劈; 么斧? 豆腐; 么豆? 黄豆; 么黄? 蚂蟥; 么蚂? 蝌蚪; 么客? 稀客; 么稀? 饭稀; 么饭? 麦米饭; 么麦? 小麦; 么小? 完了!

这首童谣, 一问一答, 连问连答, 既要考虑回答问题, 又要顾及合辙押韵, 脑筋反应慢了、词语积累少了还真不行。从内容看, 貌似东扯西拉, 实则通过词语的连环滚动, 寓学习于游戏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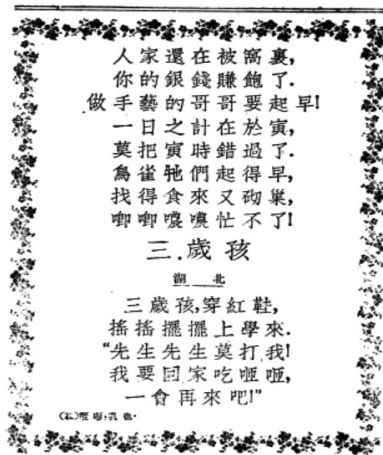


陶行知改编 “三岁的伢”

三岁孩, 穿红鞋, 摇摇摆摆上学来。
先生先生莫打我, 我要回去吃啫喱, 一会再来吧!

这首滑稽而有趣, 选自黎锦晖、吴启瑞、李实搜编《中国甘省儿歌集(第二集)》第6页。

鞋, 武汉话读如 hǎi, 这与后面的句子就很押韵了。先生指老师, 教书先生。啫喱(zǎ·za), 指妇女的乳房, 《白雪遗音·马头调·偷情》: “冰冷的手儿, 将奴的啫喱摸”, 周立波《暴风骤雨》第一部十八:



“娘们也跟着起来，用一条麻袋，裹住她的胸前一对大咂咂”，旧时还有“咂儿(乳头)”一词。吃咂咂，即吃奶，武汉话俗呼“吃妈妈(mà·ma)”，笔者猜测，这里的“妈妈”可能是“咂咂”的变读，“吃妈妈”在书面看起来有些别扭，建议可以写作“吃咂咂”。

此谣流传甚广，版本也多，大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曾亲自为孩子们创作编写几百首童谣，其中一首《三岁小孩上学》就是根据这首童谣改编的(详见《陶行知儿歌》第35页，中国和平出版社，1978年12月第1版)：

三岁小孩穿红鞋，摇摇摆摆上学来。
板凳没有坐得热，“先生、先生，我要回家吃点奶”。

童谣根植于社会，反映着社会；社会在发展，童谣也在出新。武汉老童谣中的“三岁的伢”，会栽葱、会鏊磨、会打铳、会放牛、穿红鞋等，无不显露时代的痕迹，那么，现在“三岁的伢”又在干什么呢？

2012年9月19日的《武汉晨报》有篇报道《三岁伢，成麦霸，成人歌曲岔着唱》，麦，麦克风的简写；麦霸，指会唱很多歌曲。一个三岁半的小女孩，俨然成为麦霸，但她喜欢的尽是一些成人歌曲，当红流行歌曲，张口就是“让我一次爱个够”“yiyiyi，你不在我不在”，非常熟练，而一些儿歌却会得很少。

伢们爱成人歌曲远胜于爱儿童歌曲，这种现象引起了一些社会学家、教育学家的关注和担忧。

手机进入“三岁的伢”

最近，笔者收集到一首颇具当代意味的“三岁的伢”(以下系笔者据民间流传

整理，改编)：

三岁的伢，玩手机，一天到黑滴滴滴。
看动画，打游戏，刷抖音，种APP。不让他玩就翘气，一翘翘到家家的。家家说，伢呀伢，莫翘气，家家跟你买个好的。

一天到黑：从早到晚，整天。APP：英文Application的简称，智能手机中的应用软件。种：下载，安装。

家家，又称家婆，即外婆，外祖母，北京人叫姥姥。家家，有两种读音，“gā·ga”和“jiā·jia”。一般来说，黄孝、黄冈一带读“gā·ga”，武汉主城区读“jiā·jia”；老辈人读“gā·ga”，年轻人读“jiā·jia”，由此推断“gā·ga”的读音要早一些。家家的：家家那里，家家屋里；的，读如dì。

翘气，耍小性子，无端生气，翘，qiáo；武汉人把喜欢翘气的人唤作“翘气包、翘气篓子”。

手机是智能时代的一个标志，是社会进步的一种体现，手机的各种功能日益强大，已然成为人们日常生活、工作、学习、交流的必需。尽管如此，过分沉溺手机，过度依赖手机，过早接触手机，无疑是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其负面影响在孩子身上尤其明显。

伢们的问题，根子在大人。看来，科学、恰当地使用好手机，摆脱手机对我们的控制，还真不是个简单的，随便的事情。

彭翔华，湖北省非遗项目“武汉童谣”省级代表性传承人，中学高级教师，曾任葛洲坝三中校长、明珠学校党总支书记等职

“巴公房子”百年石刻及“巴公”探秘

◇ 胡全志

在上海淮海中路和武康路交汇口，有一座造型奇特的外廊式公寓大楼，始建于1924年，原名诺曼底公寓，1953年更名为武康大楼。这栋大楼8层、总高30余米，由旅居上海的匈牙利籍著名建筑设计师邬达克设计，是上海最早的一批现代化高层公寓。因外形像一只熨斗，俗称“熨斗大楼”，同时有“上海颜王”之誉。如今，其独特的锐角三角形布局样式，经典的清水红砖外墙，吸引着无数游人前往打卡，成为上海有名的网红地标。

在汉口原俄租界，也有一座与上海武康大楼形似的公寓大楼，学名为巴公公寓大楼、巴公大楼或巴诺夫公馆，俗称“巴公房子”。

2023年5月以来，修缮后的巴公房子重现旧貌，立即成为“特种兵式”游客拍照的必选景点，也堪称“汉版颜王”。



2023年修缮后的巴公房子

一方百年石刻上的“建筑密码”

巴公房子坐落在原俄租界鄂哈街（又名两仪街，今洞庭街中段）、中国街（又名

三教街，今鄱阳街东端）与列尔宾街（今兰陵路）三条路的交汇地带。类似景观在中山大道南京路与保华街之间也有，其主体建筑为金城银行，现为武汉美术馆（汉口分馆）。

巴公房子建于1910年，是上海武康大楼的“大哥”。很多游客来观赏这栋红色船形洋楼时，镜头往往聚焦“船首”部位，在此拍照留念者、各大知名媒体平台发布的巴公房子影像也无一例外。

殊不知，在这栋洋楼的尾部，也就是临兰陵路一侧，还有一个观赏亮点，即红墙正中位置嵌有一块方形花岗岩（俗称麻石）石刻几何图案浮雕。

2023年9月20日，笔者和“人文武汉”几位朋友去合作路电力博物馆参观后，顺道经过兰陵路，无意间见到这方石刻，顿时，一个谜团由此而生。

出于对历史碑刻的浓烈兴趣和新闻敏感，笔者立即用手机对石刻拍照，用随身带的卷尺进行测量记录。

这方石刻接近正方形，横长91厘米，竖高89厘米，下沿距地面96厘米。石刻有一道4厘米宽的流线型花饰内框，呈不规则形状隆起石面，上部和右部与石刻边缘平行，下部和左部则呈梯形。浮雕图案奇特，中间



巴公房子外墙上的石刻

一大片“留白”，四周分布大小不一的方块，最左边似乎还有一条通往边框外的通道。图案为抽象几何形，没有中文、俄文文字。

石刻基本完好，只是靠上部的几个方块略有缺损，大部分线条清晰、棱角分明。历经百年风雨侵蚀，特别是经过战乱和动乱还有如此形貌，也是幸事一件。

笔者是土生土长的武汉人，对巴公房子并不陌生，读中学时（20世纪70年代）有同学住在其加盖的四层楼上，常去走动。而今66岁头一次看到这块石刻，也从未见资料披露。

对百年石刻的“考古猜想”

巴公房子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块石刻呢？

起初猜测，可能是这一带的街道地图，但察看周边路形，感觉并非如此。同行的朋友也分析不出个所以然来，一时找不到合理的解释。

当天下午，用电脑放大石刻照片，一边观察，一边寻思：巴公房子的设计者将这块石刻嵌在墙上，自然有其目的，它应当是示意图，将公寓的有关信息公诸于世。

在公寓建成之初，这一石刻想必是公开的“秘密”，不足为奇。公寓的原居民，也多是外国侨民和洋行高级职员，对此应心领神会。然而，岁月沧桑，物换星移，由于没有文字说明，要揭开不解之谜，只能尝试“考古”了。

巴公房子有“大巴公”和“小巴公”之分，三角尖部的一半是“小巴公”，三角底部的一半是“大巴公”。大、小巴公房子紧靠在一起，平面呈锐角三角形。中部为三角形天井，相当于一个内院。平面单元式布局，各单元分别设置出入口，单元分户明确。

这块石刻的内容，必定与巴公房子的建筑有关。如果是建筑图，那应该是巴公房子的平面图，其整体建筑为等腰锐角三角形，而石刻并不具备这个特征。但是，如果将连成一体“大巴公”“小巴公”拆分为两个部分，又有几分相像。通过与卫星地图比较，石刻的轮廓大致与巴公房子接近，局部有些失准，因为原建筑改造过，本身也为抽象图案。

为精准求证，找到房地产管理部门工作的朋友，要来一张巴公房子平面图。经比对确认，石刻上的浮雕图案，就是巴公房子后半部分“大巴公”的平面图。

自见到石刻以来，笔者试图破解出其实用价值这一“核心机密”，近日根据公寓大楼的特点分析推断，一下恍然大悟，原来暗藏商机。它极有可能是一种商业化招租的

操作方式，那就是方便客户按照图示来选择理想的朝向和房间，如同今日的“选房”广告，而且是永久性广告。这种广告只适用于公寓大楼，其他建筑不需要这种功能。想必，这一“猜想”较为合理，但愿接近事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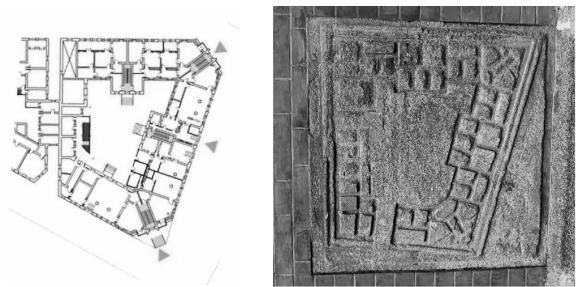
有资料显示：1910年巴公房子建成后，委托比利时义品公司经租。1912年卖给了广东银行。1921年巴氏兄弟离开汉口。1925年3月2日，汉口第二特别区正式收回巴公房子，一度作为银行办公用房。解放后收归国有，为银行职工宿舍。从这个“履历”来看，这块当初利于招租的石刻示意图，广告作用时间并不长。不过，它却留下一个历史的印记。

为什么这方石刻百年来无人发现呢？当地老居民早已腾退迁移，询问无方。通过对石刻细部观察，发现残存约八九枚膨胀螺栓的断面，其表面被角磨机磨平且略有锈迹，维修时又经水泥涂抹。由此可见，石刻曾被野蛮钻孔打眼，或是安装空调外机，或是安装招牌金属固定支架。也正因如此，石刻因祸得福被意外隐蔽“保护”下来了，在这次修缮中得以重见天日。

这方石刻没有名称，可命名为“大巴公公寓平面设计浮雕石刻”，也可简称为“大巴公房子招租广告图”。

113年来，在原租界区外国建筑中，在建筑物上镶嵌建筑平面图石刻的，目前仅有巴公房子一例。这种创意十分独到，从19世纪初至当代的国内建筑，也未见同类样本。

石刻建筑平面图，作为一种有趣的建筑设计元素，理应引起人们的关注。笔者希望有关方面能对巴公房子石刻进行现代化展陈设计，在相应部位配上图文说明标识，以彰显石刻的建筑人文价值和美学内涵，使其成为一个观赏亮点。



石刻浮雕图案与建筑平面图高度吻合



2023年修缮后的巴公房子航拍图

巴公房子的建筑设计背景

巴公房子一说由景明洋行设计，一说由俄工程师设计。

巴公房子为俄罗斯建筑风格，其尖阁三楼是一僧侣帽形的厅室，人称“俄国缠头尖”。总建筑面积约4937平方米，楼内2室1厅或3室1厅的房间，共有220套。每套房卧室、厅堂、厨房俱全，还有卫生和暖气设备，电梯上下。门面底层系麻石砌成，门窗、护墙板、橱柜系柚木等高级木料装修，楼梯用大理石镶砌及桃花石构成。上述内容，分别参见《武汉市志·城市建设志（下卷）》“建国前非住宅大楼情况表”（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第968页）、《江岸区志》“公馆别墅—巴公房子”“人物传略—巴诺夫”（武汉出版社，2009年10月，第155页和第1608页）、《老房子的述说》“公寓—巴公房子”（武汉出版社，2016年6月，武汉市档案馆编，第340页）等。

巴公房子原设计为地上三层、地下一层，前后楼顶均有一座穹顶。约是20世纪60年代，在楼顶加盖了一层，现局部为四层，后部的穹顶在改造时被拆，成为平顶。从1968年卫星地图上看，只有“小巴公”前部有穹顶，“大巴公”的穹顶已消失。

旧时，与巴公房子三边相对的历史建筑，有兰陵路上的俄国波罗馆（俱乐部）；有洞庭街上的顺丰茶栈、上海大戏院（1930年建，后改名中原电影院）、星光球场（今健康幼儿园）；有鄱阳街上的美的面包房（1918年建）、巴黎商店、苏联驻国民政府农运顾问罗卓莫夫故居（今“八七”会议旧址）、邦可西餐厅、惠罗公司（1915年建，经营茶叶和丝麻）。

解放后，巴公房子正前方的一楼门面，一度为汉口有名的上海理发厅。有趣的是，在一张1938年至1942年日伪时期拍摄的老照片上，该门面上贴着“中国男女理发公司”招牌和广告，文字依稀可见。

巴公房子1993年公布为武汉市首批一级优秀历史建筑，2019年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2021年列入第八批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

“巴公”披着一层神秘面纱

巴公房子的主人是“大巴公”J·K·巴诺夫（J·K·PANOFF）和“小巴公”齐诺·巴诺夫兄弟，据传是俄国贵族，沙皇尼古拉一世的亲戚。1891年4月，俄皇太子（沙皇尼古拉二世）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访问汉口期间，参加了汉口俄新泰砖茶厂25周年庆典，会见了他的表兄、俄阜昌砖茶厂厂主J·K·巴诺夫。

“大巴公”生卒年月不详，1869年到汉口，随后任俄商新泰洋行大班。1874年，他与曾任英租界工部局董事的莫尔强诺夫、彼恰特诺夫及先后任俄租界工部局首任总董、英租界工部局董事的拉萨丁等，在英租界洞庭街南京路段（今湖北省茶叶公司）开办阜昌洋行，任联合经理。同年，又开办阜昌茶厂任联合经理。1896年推选为俄租界市政会议（董事会）常务董事，1902年前任俄国驻汉口领事。

在俄租界未开辟前，巴诺夫购买了曾是跑马场的一处荒地，于1910年兄弟出资15万两白银，建造了“巴公房子”。据说，1905年，巴诺夫在今汉口车站路1号修建了一座私邸，外观十分豪华，后被用作美国驻汉领事馆，现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民国时期明信片，左为巴公房子三层公寓楼原貌，右为惠罗公司大楼

关于大小巴公的身世，武汉学术界诸多学者，对地方志及其他相关文献资料所载存有不同看法，“巴公”身份似乎披着一层神秘面纱，查无实据，扑朔迷离。

武汉市社会科学院原历史研究所所长张笃勤根据俄国学者的研究，认为俄皇太子1891年4月来汉是受顺丰茶厂之请，接待方也是顺丰茶厂，而非流行说法参加新泰茶厂成立25周年。

武汉大学国学院国学博士、建筑学博士后马志亮表示，他曾翻阅俄皇太子尼古拉二世《东方旅行记》节选的“武汉部分”，其中完全没提巴诺夫，汉口俄国茶商首领是阜昌的莫尔恰诺夫，主持设备、产品展览的是李特维诺夫。

2024年1月15日，“人文武汉”公众号推出署名“楚天舒”的《江城夜话——汉口老小两巴公》一文，分享了关于巴诺夫的部分外文史料。他通过19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数十册香港出版的历年英文《名录与年鉴》（Directory & Chronicle）“汉口卷宗”，追溯了巴诺夫在汉口的来龙去脉：

“从1879年开始，直到1891年，巴诺夫在阜昌作为职员一直记录在案，从未间断。我们知道正是在这最后一年，俄皇储造

访汉口。而在次年1892年度的名录中，巴诺夫的身影在汉口已消失不见。在阜昌工作了12年后，巴诺夫离开了这家洋行。所传巴诺夫乃皇亲国戚之说，在所能查证的外文史料中不见蛛丝马迹，故此论存疑待考。”

“所谓巴诺夫之弟为机械工程师齐勒·巴诺夫（Chere Panoff）之说是不可信的。这位工程师本姓切尼巴诺夫（Cherepanoff），而这姓氏不知为何被拆开来，变成了姓巴诺夫而名切尼（或齐勒）。切尼巴诺夫在汉口的历史纪录比巴诺夫早得多，1867年即作为职员在册顺丰洋行直到1874年。”

“纵观全面列举汉口外国社区政治、商业、教育、宗教及社会的所有组织和机构的历年《名录与年鉴》及其它外文史料，并未发现任何巴诺夫无论老小担任俄国领事记录，故所传俄领事巴诺夫之说乏证无据。”“俄皇储访汉时新泰名实俱无。”

上述的考据与研究，有助于推进此前出版的史志资料有关内容的勘误与更新。

巴公其人已去，但巴公房子留下历史遗存。

2020年11月28日，巴公房子保护修缮工程举行开工仪式，由中信建筑设计研究总院负责修缮设计，项目总投资为1.4亿元。2023年2月14日获悉，这一项目获得“柏林设计奖·建筑类银奖”。

根据规划，巴公房子将成为具有全新历史体验感的高端酒店“巴公邸”，内设“万里茶道博物馆”。2023年3月18日，“星巴克臻选”巴公房子店正式开业，巴公房子由此融入江城的时尚生活。

胡全志，武汉市政府参事

武汉蔡甸王公合葬墓志铭研究

◇ 宋 贝 张 剑 朱励博 陈守宇

2022年10月20日，武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与蔡甸区文物管理所，一同到蔡甸区索河街道尹湾村处理文物报案，发现青石质墓志一通，志盖已不存。经调查，该墓志为20世纪70年代农业生产活动时发现，出土时盖碎已散失，墓志埋于私人院内，近日因房屋改造而复现。

志石横63.5厘米，纵58厘米，厚12厘米，截面呈阶梯状；志面横55厘米，纵49.5厘米。志文楷书，大部清晰可辨，共24行，计555字，每字约1厘米见方。

志文记载了墓主王道立及其子王恂所在的汉川王氏家族世系、仕宦封荫及姻亲交

游等情况，志文提及人物可与地方志等史料相互印证，有较高的学术研究价值。笔者对出土墓志铭尝试进行考释，与地方史志、历史文献相结合，以期为本地区明清历史文化研究提供新的途径。

录文

□□□王公合葬墓志铭

赐进士第分巡南汝道驻劄信阳【州】
□□□副使□□弟项一经篆盖 / 赐进士第
内閣学士兼礼部侍郎宗弟鸿绪书丹 / 公讳道
立，字凝初，先世河南南阳府新野县人，以



王道立、王恂父子合葬墓志铭

太祖公讳万一，宦 / 【游】徙居湖广汉川，代系详本族谱牒。父字和公，讳应祯，敕赠南京都 / 察院右都御使。妣林氏，太淑人，字和公，生五子。道正赠别驾；道直明 / 神宗壬戌进士，历官总宪升兵部尚书；道立道盛道望俱廩膳。公，第 / 三子也，妻林氏熊氏。生一子，讳恂，字孚如，少坳，娶周氏，牧州周君讳 / □字冲·之女孙。生一子希章，太学生，初选县佐，娶邑庠生张君讳 / □□女。生二子，业寿业广，行立未艾。甲子孟冬月望日归公魄于汉 / 阳【鹰】脑山之阳。孙希章以予知公颇悉，载拜请铭予忆。公川【庠】知名 / □□试辄第一，食廩【禄】有年，屡科不第，而读书不辍，晏如也。赋性端 / 慤，□古君子风，其才名声望，道迈高骞，可亚坝麓哉。然而小心翼翼， / 卑谦自牧，足不轻履户外。见市儿屠沽，不少玩。晚年伛偻，益恭其盛， / 德盖如此，爰【是】义方□子。而孚如公，生而淳良，学识渊博，有父风。癸 / 【巳】年【逋】弟子□旋补增□，其才以掇巍科，犹拾芥也。岂未及壮年，先 / □□□【游】【计】，公岁进士尔及，

是年而卒，伤哉！惜哉！公生于万历丁亥 / 六月十八日未时，享年七十有七。公郎生于明崇祯丁丑七月二十 / 八日卯时，享年二十有七。然而公有孙，孙生子未艾，总以忠厚启【祐】， / 其昌可竟乎哉？谨按大略为之志而铭之。

铭曰：

涇水之濒 笃生异人 既公及子 钟
□□钧 令孙盘郁

曾玄岐嶷 爰高且大 玉堂于门 后
世未艾 际此镌铭

大清康熙甲子十月望日武英殿大学士
【年】□□【吴】正治顿首谨述

（注：/表示分行，【】表示原字不够清晰推测而得，□表示未能辨识）。

墓志铭考释

该墓志铭为明末清初汉川王道立及其子王恂的合葬墓志铭。

汉川王氏以明晚期王道直最为知名，为兵部左侍郎署尚书事，升左都御史掌院事，王道立为王道直三弟。志文虽字数不多，但涉及墓主生卒、迁葬、合葬和汉川王氏的家族世系、仕宦封荫、姻亲交游等多个方面。笔者根据墓志铭志文，结合地方志及其他史籍材料，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考证。

1. 王道立父子生卒、迁葬及合葬。

志文记载王道立生于明万历丁亥（1587年）六月十八日未时，享年七十有七，顺推可得其卒于清康熙三年（1664年）；记载王道立之子王恂生于明崇祯丁丑（1637年）七月二十八日卯时，享年二十有七，顺推可得其卒于清康熙三年（1664年），父子同年而卒。根据志首“□□□王公合葬墓志铭”可知此墓志即为王道立及其子王恂合葬墓

志铭。笔者在墓志出土地进行调查，由于常年生产活动影响，墓志出土位置已被取土平整，现场未见有封土、墓砖等遗存。

志文结尾落款时间为“大清康熙甲子十月望日”，大清康熙甲子年为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此时距离王道立及王恂父子离世已20年，志文记载“归公魄”意指二次迁葬。再根据志文所载“甲子孟冬月望日归公魄于汉阳【鹰】脑山之阳”及“孙希章以予知公颇悉，载拜请铭予忆”，可知于康熙二十三年在王希章的主导下，将其祖父王道立及其父王恂二次合葬于汉阳府鹰脑山之南。

经笔者调查，墓志出土地位于当地俗称“英领山”之南，而现“英领山”或为当地人由“鹰脑山”读音误传而易名。迁葬现象在明末清初本地区也较为常见，迁葬或受战乱影响，或受经济因素影响，或受土地交易影响，或受孝道影响，或受葬地风水影响等等。而明清时期父子合葬现象较为罕见，全国仅有数处见于文物档案及新闻报道。根据志文判断墓志应为王道立父子二次迁葬时所立，而父子合葬现象，在明清时期本地区为首次发现。另据同治《汉川县志》载“总宪王道直墓在甌山下”，甌山位于汉川市马鞍乡，与英岭山相距约10公里，汉川王氏一族应未有严格规划的家族墓地。

2. 家族世系。

志文记载王道立先世为河南南阳府新野县人，自太祖公王万一由新野县迁至汉川生活。王道立父亲名为王应祯，生王道立兄弟共五人，分别为王道正、王道直、王道立、王道盛、王道望。王道立有一子，名为王恂。王恂有一子，名为王希章。王希章有二子，分别取名为王业寿、王业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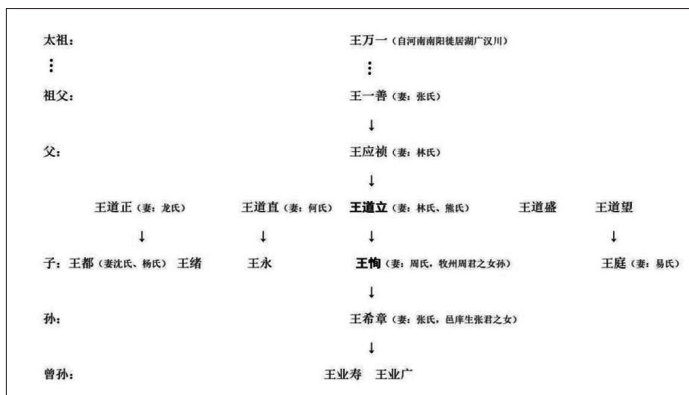
乾隆《汉阳府志》及同治十二年《汉川县志》对汉川王氏多有记载，根据文献记载，可补充汉川王氏家族谱系。地方志载王道立祖父为王一善，王一善妻为张氏。王道正妻为龙氏，子为王都、王绪。王道直妻为何氏，子为王永。王道望子为王庭。根据地方志记载，汉川王氏除明显提及为王道立王氏宗亲外，还载有王相、王希蘧、王希文、王希仁、王希述、王希洪、王业久、王业宏等名，笔者推测可能均为汉川王氏后嗣。

综上所述，汉川王氏取名遵循家族字辈传承，太祖公名王万一，王道立祖父为“一”字辈，父亲为“应”字辈，其后“道”字辈，子取名单字，孙为“希”字辈，曾孙为“业”字辈。根据墓志铭及地方史料可初步厘清明末清初汉川王氏的家族世系。

3. 仕宦封荫。

汉川王氏为书香门第之家，有科举仕途之人，家族不乏显宦，势力雄厚。由墓志铭、地方志等史料文献记述，汉川王氏仕宦封荫信息记载丰富，而志文与史料基本能够印证。

王一善为庠生，后以孙道直贵，封通议大夫南京督察院左都御史，妻张氏，封淑人。王应祯为庠生，以子道直贵，封通议大夫兵部左侍郎，妻林氏，封夫人，王应祯“妻



汉川王氏家族世系

林氏”与志文中道立“妣林氏”契合。王道正为廪生，赠承德郎，妻龙氏，封宜人。王道正之子王都为通判，赠承德郎，妻沈氏、杨氏封安人。王道直为进士，授资德大夫，督察院掌院事左都御史兼兵部尚书，祀乡贤，妻何氏，封夫人。王道直之子王永，廪贡，恩荫五品。王道立赠文林郎。王道立之子王恂赠文林郎。王道立之孙王希章授儒林郎，武陵县训导，妻张氏，封孺人。王道望以子王庭官赠文林郎。王道望之子王庭授文林郎，江南太湖县知县，妻易氏，封孺人。

由墓志铭志文及地方史料可知汉川王氏家族的核心人物是王道立二哥王道直，王道直由举人到进士而入仕途，由于王道直的关系，朝廷对王氏家族多有封荫。据同治十二年《汉川县志》卷三《选举表》载，其余汉川王氏多由诸生之途径入仕，如王道望为顺治三年丙戌科贡生、王希章为康熙二年癸卯科贡生等例，墓志文记载王恂“岁进士尔及”，“岁进士”亦是诸生中贡生之说，王道直之后鲜有科考入仕之人。

王道直（1584—1653年）字履之，号孺初，明代汉川南河人。根据乾隆《汉阳府志》、同治十二年《汉川县志》记载，王道直为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乙卯科湖广乡试举人，天启二年（1622年）壬戌科进士。初授保定府推官，郡守欲立魏忠贤生祠，王道直坚持不可。崇祯元年（1628年）擢浙江道御史，巡按江南苏松，请停织造恤灾。四年（1631年）巡关。六年（1633年）掌河南道印。七年（1634年）升太仆寺少卿，提督东路。八年（1635年）升光禄寺卿，



墓志拓印工作由武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刘永亮完成

迁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提督操江。十年（1637年）召入为兵部右侍郎，加服俸一级。十二年（1639年）转左，署尚书事。叙黔功，加一品服俸。十三年（1640年）七月，升左都御史，掌院事。十五年（1642年）五月，谢病免职归。后居家，年七十而逝。

4. 姻亲交游。

关于家族婚姻关系，志文所载诸如王应祯妻为“林氏”；王道立妻为“林氏、熊氏”；王恂妻为周氏“牧州周君讳□，字冲□之女孙”；王希章妻为张氏“邑庠生张君讳木□女”，在乾隆《汉阳府志》及同治十二年《汉川县志》中均有记载，与地方志记载人物关系相契合。志文记载王恂“娶周氏”，王恂妻周氏在乾隆《汉阳府志》有专载，周氏“年二十五，夫歿”，可推周氏生于明崇祯十二年（1639年），卒于雍正四年（1726年），享年八十七。

明清时期汉川以戴氏、周氏、尹氏、龙氏和王氏家族势大，通过墓志铭和地方志史料可知，汉川王氏在当地交游广阔，与当地戴氏、龙氏、尹氏多有姻亲关系。王道直娶妻何氏，何氏为明末清初汉川名人何仲衡之妹，何仲衡妻为明代中宪大夫尹应元的女儿，可知汉川王氏与尹氏有一定的关联。汉

川戴氏以明代嘉靖年间兵部尚书戴金知名，汉川戴氏宗谱有关于王道直的记载：“先生资质，玉色金声；先生德行，温厚和平；元气之会，浑然天成；源远流长，庆衍后昆。明崇祯三年岁次庚午仲夏月之吉，兵部侍郎姻晚王道直拜赞。”推测王道直与汉川戴氏一族应有姻亲关系，但明崇祯三年王道直时任浙江道御史，“兵部侍郎姻晚王道直拜赞”应为录谱之人后增。王道正妻子龙氏为名宦龙纳铭之姊，龙纳铭为明天启七年丁卯举人，清顺治四年丁亥进士，历任户部山西司郎中，出守贵阳都匀知府，升分巡副使道。乾隆《汉阳府志》又载汉川生员龙纳约娶王道直妹王氏，可见明末清初之时汉川王氏、龙氏两家姻亲关系较为深厚。由此观之，汉川王氏应与汉川其他几大家族在明末清初之际交游密切、关系深厚。

5. 墓志铭述者、篆者、书者。

墓志铭由清康熙年武英殿大学士吴正治谨述而成文。吴正治（1618—1691年）字当世，湖广汉阳府人，为顺治五年（1648年）戊子科举人，顺治六年（1649年）己丑科进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出为江西参议，迁陕西按察使，擢工部侍郎，调刑部，升都察院左都御史，进工部尚书，改礼部。康熙二十年（1681年）授武英殿大学士，主修《太祖高皇帝实录》成，以总裁官加太子太傅。吴正治与墓主王道立为同乡，按出生年月王道立较吴正治大三旬，墓志铭载“孙希章以予知公颇悉，载拜请铭予忆”和“谨按大略为之志而铭之”，可知吴正治对同乡王道立及其子王恂较为熟悉，王道立及王恂生平事迹由王希章拜请吴正治口述，且作铭而记之。

墓志盖已破碎散失，志文开篇载：“赐进士第分巡南汝道驻劄信阳【州】□□□副

使□□弟项一经篆盖”，可知此墓志铭由项一经篆盖。项一经，字克赞，生卒年不详，湖广汉阳府人，为顺治十四年丁酉科举人，顺治十六年己亥进士，出为建德知县，后行取授吏部主事，晋郎中，转南汝副使，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升贵州按察使。告老归乡后，死后葬于蔡甸蓼山北新安堡。1987年5月9日，在蓼山镇新安堡村发现项一经墓，出土一顶上有龙纹、蝙蝠图案和“奉”“天”“日”字样的铜质官帽。项一经亦是王道立同乡，加之汉川王氏为明末清初望族，可推测由王希章请其为王道立、王恂合葬墓志铭篆盖。适时为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项一经为南汝副使，暂未升贵州按察使，与志文相印证。

由墓志铭“赐进士第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宗弟鸿绪书丹”可知书丹之人为王鸿绪。王鸿绪（1645—1723年）字季友，江南松江府华亭县人，康熙十二年（1673年）考取进士，廷试获榜眼，授翰林院编修，康熙二十年加侍读学士，康熙二十一年任《明史》总裁官，并主修列传，不久即升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康熙二十四年充会试总裁官。康熙二十六年升左都御史。后历任工部尚书、户部尚书，因卷入皇太子废立风波中，以原品休致。王鸿绪善行草，书学董其昌，腴润有致，为董其昌再传弟子。董其昌为明后期著名书画家，其书法出入晋唐，自成一格，对后世影响巨大。梁巘《评书帖》云：“董公其昌传执笔法于其邑沈公荃，荃传王公鸿绪，鸿绪传张公照，照传何公国宗，国宗传白下梅君鉞。予学书三十岁，后始缘鉞得其传。”董其昌传笔沈荃，沈荃传笔王鸿绪，构成了明末清初松江地区的董其昌笔法传承的主线。据同治十二年《汉川县志》载王道直为诸生时，曾拜学于董其昌门下，

与董公有师生情谊。而王鸿绪为董其昌再传弟子，精于书法，王道直为墓主王道立兄长，墓志铭中王鸿绪对墓主王道立自称“宗弟”，应为同姓不同族的谦称。书丹时间为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王鸿绪时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与志文相吻合。汉川王氏王道直曾拜学于董其昌，与王鸿绪有同门之谊，且又同姓，加之与时任武英殿大学士吴正治的关系，所以在王道立及其子王恂死后，在王希章的请托下，求得王鸿绪为墓志铭书丹。

志文勘误及史料补阙

墓志铭所载吴正治“谨按大略为之志而铭之”，志文对王道立父子生卒时间及汉川王氏的家族谱系进行了介绍，同时对王道立和王恂的学识和品行给予了极高评价。志文中提及人物与地方史志基本对应，对汉川王氏朝廷封赠的官职与地方史志偶有不合之处。通过墓志铭的志文和地方史志相结合，可对墓志铭志文进行勘误，同时对地方史志的补阙和完善也有重要作用。

1. 志文勘误。

按《明史·职官志》记载：“都察院，左、右都御史，正二品；左、右副都御史，正三品。”按照明代官员封赠制度，一品赠三代，二品、三品赠两代，四品至七品赠父母妻室。封赠的职级，正一品至从七品，曾祖父、祖父、父各照该官员现任职级，赠以相应的散阶。按《明史·卷七十二·职官一》记载：“外命妇之号九：公曰某国夫人，侯曰某侯夫人，伯曰某伯夫人。一品曰夫人，后称一品夫人。二品曰夫人，三品曰淑人，四品曰恭人，五品曰宜人，六品曰安人，七品曰孺人。”

墓志铭志文及地方史志均载王应祯及

其妻林氏以子王道直而获敕赠。王道直按史载曾任正三品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从未任职正二品都察院右都御使。志文“父字和公，讳应祯，敕赠南京都察院右都御使。妣林氏，太淑人……”，敕赠王道直其父二品官职和其母三品淑人封号相矛盾。按职制，若王应祯和林氏在王道直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时受敕赠，则王应祯应同样敕赠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之职位，林氏为太淑人。

再根据同治十二年《汉川县志·卷四·封荫表》载：“王应祯，庠生，以子道直贵，封通议大夫兵部左侍郎，妻林氏，封夫人。”说明随着王道直历官升职，其父母王应祯和林氏可能又再次受封赠。史载王道直在崇祯十年（1637年）召入为“兵部右侍郎，加服俸一级，十二年（1639年）转左，署尚书事。叙黔功，加一品服俸”。按《明史·职官志》兵部左侍郎为正三品，由于其加一品服俸，所以林氏封为夫人，而王应祯此时或应封赠为“通奉大夫”。根据“凡祖母、母因子孙推封者都加‘太’字，若已亡则不加”，可知林氏初次受封“太淑人”时仍在世，而二次受封时则已亡故。

墓志铭志文记载“道直明神宗壬戌进士，历官总宪升兵部尚书”，此处“神宗”应为“熹宗”，明神宗万历在位未有壬戌年。地方志亦记载王道直为明熹宗天启二年（1622年）壬戌科进士。王道直后任兵部左侍郎，署尚书事，志文“历官总宪升兵部尚书”或为记录错误，亦或有意为之。

2. 史料补阙。

在万历《汉阳府志》、乾隆《汉阳府志》及同治十二年《汉川县志》对汉川王氏均有记载，但对汉川王氏的原籍和迁徙均未提及，我们由此墓志铭可知王氏原籍河南南阳府新野县，由太祖公王万一而徙居至湖广

汉川。由现汉川市《王氏宗谱》可知记载“始迁祖万一，元末避红巾兵由河南新野迁居汉川长城乡（今汉川仙女山街道）”。墓志铭与族谱结合，可知汉川王氏的源流。

史志资料中对王氏五兄弟中王道盛均无记载，由墓志铭志文可知，王道盛与王道立、王道望均为诸生，而食廪膳。史志对墓主王道立妻没有记载，通过墓志铭志文可知王道立娶妻林氏及熊氏。通过墓志铭志文我们亦可知道王道立、王恂父子同年而卒，为父子合葬且进行了二次迁葬。通过墓志铭的考释，我们对汉川王氏与当地名绅望族的姻亲和交游也有了一定了解。

结语

本文依托新发现墓志铭材料，将志文内容予以释读，对墓志出土地点周围进行走访调查，并结合地方志等史料文献记载，厘清了墓主王道立父子的生卒及迁葬情况。父子二人同年而卒，死后又在孙王希章的主导下于康熙二十三年合葬在汉阳鹰脑山，为研究本地区明末清初丧葬习俗及地名变迁提供了新的材料。但志文及史料对父子二次合葬前的丧葬情况均未提及，又因墓志出土位置地貌变化较大，无法考证其迁葬原因。

通过志文与地方志、族谱等史料的相互印证与补充，丰富完善了汉川王氏家族的世系和仕宦封荫情况，并了解了汉川王氏与地方其他名门望族的姻亲交游情况，对研究本地区明清历史文化具有重要意义。笔者通过志文、地方志及族谱等材料有明确记载的信息，初步建立起的王氏家族世系还不够完善，如道直妻除有“何氏”外，《钦定古今图书集成·明伦汇编·闺媛典·第八十四卷》

还载“王道直妻郑氏”，道直应有四子，家族关系有待进一步补充。

另由墓志铭志文和地方史志可知，汉川王氏、龙氏在明朝灭亡之后于清朝初期仍多有宦迹，且与当地和中央重臣均有交游。而据乾隆《汉阳府志·卷之三十三下·人物四·乡贤志·汉川县》载：“周少保嘉谟、王都宪道直，皆前明社稷重臣，今王都宪于康熙十四年置主入祠，而周少保竟不预俎豆之列，殊为阙典。”可知汉川王氏、周氏在本地区明代均为大族，而在清初王氏仍然延续其声望，而周氏家族势力渐渐消弭，鲜有出仕为官之人。此墓志铭的发现，为研究本地区明末清初氏族的兴衰也有一定意义。

墓志铭述者、篆者、书者均为地方乃至中央朝廷的重要人物，尤以墨迹出自王鸿绪之手，其研究意义更添几分。王鸿绪为董其昌再传弟子，精鉴赏，工于书法，其所留墨宝多行草，具遒古秀润之趣，沈荃引王子敬书羊欣衣裙典赞王鸿绪书翰“翰染羊裙墨，吟高饮雪春”。该篇墓志铭行以楷书，笔法端稳典雅，用笔沉著，具有重要的艺术价值和历史文化价值，为王鸿绪书法艺术研究和明末清初董其昌书法传承与发展提供了重要实物材料。

宋贝、张剑、朱励博，武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馆员；陈守宇，蔡甸区博物馆馆长

大自然馈赠的珍宝 ——华中农业大学博物馆

◇ 王若颖

华中农业大学博物馆位于风景秀丽的武汉南湖之畔、狮子山麓，筹建于2006年，2010年初对外开放。

华农大博物馆收藏自然标本近30万份，集农业教学、科研、科普于一体，堪称“自然标本王国”。从微生物到植物、动物，展现了生命波澜壮阔的自然演化过程，追溯着人类农业文明历程的筌路蓝缕和取得的辉煌成就，既展现大自然的绚丽多姿，又体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既反映华农雄厚的办学实力，亦彰显学校深厚的历史积淀和人文底蕴。

奇异的自然世界

博物馆的基本陈列，以“生命科学”为核心展示内容，分为“蛰鸣蛱趣（昆

虫）”“野性自然（野生动物）”“温驯家园（畜牧兽医）”“本草芳华（植物）”“大地宝藏（土壤地矿）”等多个专题。徜徉其间，如同进入奇异的自然世界，在人文与自然交融、时间与空间交错间，仰望先民的智慧与精神；在天地玄黄洪荒之间，敬畏生命的荣耀和尊严；在蓝色星球沧海桑田的大幕下，静静地咏叹人类文明与自然历史相互交织演化。

“蛰鸣蛱趣”展厅以展板和实物标本的形式，向大家展示昆虫世界的绚丽多彩。所谓“蛰”，意为蟋蟀，如岳飞《小重山》中“昨夜寒蛰不住鸣”。所谓“蛱”，意为蝴蝶，如杜甫《曲江》中“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蛰鸣蛱趣”描绘出的就是这样一幅昆虫世界的生动画卷。

蝴蝶是昆虫里最美丽炫目的类群，展



华中农业大学博物馆外景

厅展示了唯一列入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的蝴蝶品种——金斑喙凤蝶，第我国特有的极珍稀蝴蝶，被世界蝴蝶学者誉为梦幻中的蝴蝶。此外，展厅还收集了黑脉金斑蝶、多尾凤蝶、绿鸟翼凤蝶等其他多个国家的“国蝶”，让公众可以一饱眼福。

“野性自然”展厅以各类标本展示野生动物及其生存环境的多样性，而生物多样性是地球生命的基础。我国生物特有珍稀属、种多，动植物区系起源古老，物种繁多，是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展厅收集了包括中华鲟、虎纹蛙、扬子鳄、金雕、白掌长臂猿等国家重点保护动物在内的数千件珍贵标本，为广大观众营造了一个真实、多姿多彩的野生动物世界。

在馆藏的珍贵标本中，制作年代最久远的一批，可追溯至新中国初期，如闻名天下的“武昌鱼”——团头鲂，其标本不仅完好保存至今，更因1955年由水产系主任易伯鲁教授发现并定名而意义非凡。

“温驯家园”展厅展出家禽家畜标本，不仅在国内属首创，收集的种类也比较齐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收集了许多师生在教学和科研过程中制作的骨骼标本、浸制标

本、原色标本、透明标本、器官血管灌注标本和剥制标本。同时，展示了家禽家畜及养殖经济动物的系列剥制、解剖、浸制标本及中国传统兽医学相关诊疗手段、病理切片、畜牧兽医学中草药标本。

“大地宝藏”展厅以实物标本、展板及电子沙盘，展示各类土壤标本、土壤资源概况和各类矿物岩石标本。岩石与矿物是这样一些奇特的载体，它们记录冰河时代，记录地球表面的沧桑变化，记录地球诞生以来的所有地质信息。它们是时光的胶囊，包裹着从亿万年前到今天地球经历的风霜与长烟。随手捡起一块抚摩，仿佛看见它从火山烟尘里浴火而出，仿佛看见它随泛滥的河流翻滚，仿佛看见它静静斜躺在湖畔的泥沙里，仿佛看见一只三叶虫正从它上面爬过，仿佛看见一只小恐龙踩过它跑进丛林。

中国地形地貌电动沙盘模型，集现代声、光、电等高科技于一体，直观反映我国土壤形成因素和土壤分布状况，为博物馆又一特色。此外，还展示了全国各地的土壤，农业土壤和世界范围内的岩石、矿物、地质构造、古生物化石等标本。

“本草芳华”展厅以展板和植物精制标本的形式，展示植物的进化历程、植物多样性、世界珍稀濒危植物、中国传统名花以及华中地区常见园林栽培植物。

如果说动物展厅呈现一幅小型生态图，那么植物展厅则演绎着植物生命历程的不同形态。在“春华秋实”展区，从各类植物种子里，感受春天播种的希望和秋天收获的满足；在“立木年轮”展区，透过木材侧切面，看到植物生长所经历的阳光雨露；在“根深叶茂”展区，了解叶片的生理功能，重温光合作用的原理；在

“品茗千年”展区，品绿茶、白茶、黄茶、青茶、红茶、黑茶的不同清香。还可以学习树干的构造，认识四种名贵木材。降香黄檀的木屑泡水可降血压、血脂；紫檀制作的器物不需要油漆表面，就可以呈现出缎子般光泽；鸡翅木有微香气，木材心材的弦切面有鸡翅（“V”字形）花纹，深受文人雅士喜爱；铁力木是木质最坚硬的一种树，可供军工、造船、建筑、特殊机器零件之需要，也可供制作乐器、工艺美术品之用。

华农大博物馆丰富的标本资源，是师生几十年来收集、制作、保存下来的，它们承载了老一辈华农人的心血与智慧，也见证了华中农业大学的办学历史。

蒙古马标本

一具高大的蒙古马干制标本，是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也是馆藏最早的标本之一。站立的烈马一侧外貌完整；另一侧则“开膛破肚”，深层肌肉、内脏器官以及



蒙古马干制标本

血管神经分布一目了然，很有视觉震撼力。标本制作于1964年，当时技术还不成熟，只能在寒冷干燥的地方制作标本，由动医学院的林凯老师在内蒙古历时8个月制作完成，弥补了学校标本的一个空缺，完好保存至今。

在蒙古马干制标本的旁边，有一具牦牛骨骼标本，也是来之不易。它原是2008年从西藏运来的一副鲜活牦牛骨块，后由学校相关专业老师亲手制作，历时近一年制作成功。

中华鲟标本

两条中华鲟标本静静“躺”在玻璃窗内，但身躯依然饱满，似有无限活力，足以令人畅想其在长江中畅游的景象。中华鲟是我国一级保护动物，其标本当是“镇馆之宝”，也是博物馆标本的大物件。中华鲟最早出现于2亿3千万年前，素有“水中大熊猫”之称。

中华鲟曾是恐龙的邻居，为白垩纪残



中华鲟标本

留至今最为古老的现生鱼类之一，仅中国独有，也是世界 27 种鲟鱼中最珍稀的一个物种。但是由于环境污染、过度捕捞等因素，严重影响了中华鲟的洄游路线和繁殖场所，种群数量急剧减少，并濒临灭绝危险。

这两条中华鲟是雌性，体重皆超过 300 公斤，但这还不算是个头最大的。长江流域的渔民间流传着这样一句谚语：“千斤腊子万斤象，黄排长大不像样”，其中“腊子”指的就是中华鲟。

这两条中华鲟 1992 年遭受渔民非法捕杀、渔业部门没收后送给华农的，由陈喜群老师制作成标本。

武昌鱼标本

在中华鲟旁边，还有一个对华农人极具纪念意义的物种——团头鲂，即大名鼎鼎的武昌鱼，它是 1955 年由华农水产学院创始人之一的易伯鲁教授命名的鱼种，也是新中国成立后命名的第一尾鱼。

这条武昌鱼标本，由华农师生采集自梁子湖，其制作者已无从考证。但它是馆藏

中制作最早的标本，更是目前全国唯一的武昌鱼“模式标本”。也就是说，它是辨别和鉴定是否“武昌鱼”的唯一标准。此类鱼营养丰富，味道鲜美，老少皆宜，已成为湖北武汉的旅游特产。

武昌鱼是极具纪念意义的本地物种，那么“湖北白猪”也不得不提。博物馆珍藏着赫赫有名的“六个一”中的“一头猪”标本。“湖北白猪”瘦肉率极高，由华农熊远著院士培育并命名。

在 2001 年首届湖北种猪拍卖会上，一头 90 多公斤的种猪拍出 15.5 万元的高价。

此外，博物馆收藏的虎凤蝶、东北虎、北极熊、银杏、红豆杉等珍稀特色标本极具研究价值。

华农大博物馆收藏及展示的自然标本，视觉冲击力强，深受公众尤其是学生的喜爱，为此开展巡展、志愿服务等多种公益活动。“鳞贝化生之路”巡展，从掘足纲与多板纲到头足纲，从无颌鱼到辐鳍鱼，让学生沿着鱼类以及贝类进化之路，近距离地接触平时很少见到的动物，体验自然生物进化的“长征”之路。

华农大蓝色精灵志愿服务队（简称“蓝色精灵”），是全国首支带有科研性质的大学生江豚保护志愿者团队。2022 年，博物馆与“蓝色精灵”联合举办“移动博物馆，科学零距离”校园巡展，让武汉中小學生真切感受鱼类、贝类等软体动物的美丽，唤起对这些大众关注之外的动物的保护意识。

王若颖，华中农业大学博物馆馆员